

國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葉門內戰比較研究(1962-1967/2014-2018)：認同
與內外的行為者互動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emen Civil Wars (1962-1967/2014-
2018): Identity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ctors

指導教授：張景安 博士

研究生：謝友綸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謝辭

在完成碩士論文的路上，實在受到許多人的提點與照顧。首先是要謝謝指導老師張景安教授不厭其煩地給予我關於論文寫作上的指點。從一開始的方向設定到後來的文句潤飾，都讓我獲益良多，學習路上能有這樣盡責的老師指導我，實屬珍貴。也要謝謝兩位口委老師連弘宜教授與崔進揆教授，從論文大綱到最後的口試，也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意見，今天這本論文才能成形。

另外也要謝謝家人辛苦的付出支持我的學習，家人的支持是我在學術路上最穩固的依靠，沒有這樣的支持，我實在難以完成攻讀碩士的目標。此外也要謝謝在研究所遇到的同學和朋友的支持，特別是雨珊、韻如、材瀚以及學昌的陪伴，無論是一同分享論文寫作的心路歷程，或是單純的談心與陪伴，都是我完成碩士學位的寶貴動力。也要謝謝茵茵以及映羽，感謝他們樂意地幫我完成論文的校稿，在這最後緊張的時刻，分擔我的壓力。

這篇論文仍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抱持著對中東研究的熱情，還是希望能把這塊被世人遺忘的角落呈現給大眾。或許這篇論文對葉門人民的苦難並未能有直接的幫助，但若是有人因此稍微注意到這個歷經最嚴重人道危機的地方的話，那這篇論文或許也是值得了。

摘要

中東地區因為人工疆界的因素，認同團體與國界之間往往不一定吻合並形成跨國界的認同。因此區域內國家內部往往得面臨不同認同的競爭，而這些競爭則因為跨國界認同的關係影響到區域層次。葉門長期以來一直面臨了內部動盪的問題，而區域間的行為者也曾多次大歷屆葉門內部衝突，而當這些區域行為者介入葉門時，似乎又沿著某種認同分歧的界線，選擇支持不同陣營。而為了解這樣認同與不同內外部行為者的關聯，本文將選定探討 1962 年與 2014 年的兩場葉門內戰，檢視葉門在現代國家的歷史上，其認同與內外行為者的關係變化。

同時，本文也採用學者 Mabon 所提出的這種內外認同安全困境的概念，去分析探討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內外部行為者的互動關係。而透過本文的探討可以發現，葉門內部所存在的分裂狀況提供了不同認同競爭的場域，而當不同認同競爭時又會吸引外部的行為者沿著自身的認同選擇介入葉門，最後當這些區域行為者進行介入時，也會為內部的認同競逐帶來衝擊，並限縮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能力。此外，本文也看到，當內外部不同行為者利用認同作為擴大影響力的工具時，也會使得原本在區域間共存的認同產生異化，並進而發展成互斥的關係，如當今中東地區所呈現的「遜尼什葉衝突」即是區域內國家在互相競逐的過程中，逐漸建構出來的。

關鍵字：葉門內戰、認同、教派衝突、泛阿拉伯主義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artificial border from colonial times, the border between different identity groups are not in lines with states border, and this help to establish inter-states identities to exit in the middle east. Thus, countries the region tends to face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identities within its border, and this competition also has implication in a regional level. Yemen as a country in the region, it also faces this kind of turmoil, and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ivil wars alongside with external intervention, it seems to match the pattern stated above. Thus,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ies and different actors in the two civil wars that happened in Yemen, which is the 1962 one and the one happened after 2014.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use Mabon's concept of internal-external identities security dilemma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through the lenses of identities. In the end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competition of identities inside Yemen is one of the factor that draws the external actors to intervene, and through interventions the external actors bring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nternal identities. And also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powers can also construct a hostil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ies that were originally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Civil wars, Yemen, Identities, Pan-Arabism

目次

摘要.....	I
ABSTRACT.....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3
第三節 名詞界定與概念釐清	5
第四節 文獻回顧.....	7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19
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5
第七節 章節安排與研究成果.....	27
第二章 1962 年北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29
第一節 北葉門內戰之發展.....	29
第二節 葉門內戰中的認同:背景與來源.....	31
第三節 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改革派與王室	34
第四節 外部的安全困境:泛阿拉伯與伊斯蘭.....	39
第五節 認同的內外互動:動機與衝擊	48
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51
第一節 葉門內戰爆發:阿拉伯之春之遺緒	51
第二節 認同的形成:背景與來源.....	55
第三節 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政治安排的僵局	59
第四節 外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教派衝突的建構.....	63

第五節 認同的內外互動：動機與影響.....	70
第四章 兩次內戰的延續與變化	73
第一節：比較基礎的建立.....	73
第二節： 第一階段——認同的形成背景	77
第三節：第二階段——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82
第四節：第三階段——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86
第五節：兩次葉門內戰的延續與差異.....	90
第五章 結論	94
參考文獻.....	99



表次

表 1-1.....	25
表 4-1.....	91



圖次

圖 1-1.....	26
圖 2-1.....	42
圖 2-2.....	47
圖 3-1	68
圖 3-2	69
圖 4-1	7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 2010 年底，突尼西亞的一名小販選擇了以自焚抗議政府長期的貪腐與不公，隨後便引發了一波抗議的浪潮。這場抗議的浪潮不只影響了突尼西亞本身的政治安排，也擴散至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因此，中東地區掀起了一股政治動盪的局勢。從埃及的穆巴拉克總統下台，到敘利亞發生了內戰，中東地區國家面臨了一波政治權力的再安排。而這樣的風潮也傳至了葉門，街頭上開始出現反政府示威遊行的抗議，在這群上街抗議的青年中，其組成跨越了各部族與教派。且主要訴求為針對舊有政治菁英進行改革，及改善國家腐敗情況。

然而，與原先期望的政治轉型所不同，葉門卻陷入了內部的動蕩。而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在這樣的情勢下介入協調，提出政治轉型計畫。前總統 Saleh(Ali Abdullah Saleh)因此在 2011 年底下台，由原來的副總統 Hadi(Abdrabbuh Mansur Hadi)擔任新總統，並進行政治權力的轉移和安排(Lynch, 2016)。然而在新的政治轉型計畫中，各方勢力未能達成共識，其中胡賽武裝組織(Houthis)和葉門政府之間更是有相當的分歧。在 2014 年，新政府的一連串政策再次激起不滿的民怨，這使得前總統 Saleh 和 Houthis 的勢力有向中央政府挑戰的機會，於是兩股勢力結合之下，圍攻首都沙那(Sana'a)，葉門的情勢至此演變成全面的內戰，同時這也顯示了 GCC 所策動的轉型計畫失敗。然而，葉門這時也成為區域行為者的權力競逐場域。沙烏地 2015 年後大力的介入葉門內戰¹，並宣稱胡賽組織為受伊朗支持的團體(Pardhan, 2017)。另一方面，雖未

¹ 沙烏地於 2015 年起聯合其他國家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出兵葉門進行干預，支持 Hadi 政府。

有證據能直接顯示伊朗有在軍事上對 Houthis 進行支持，但伊朗至少也對 Houthis 進行了政治與外交上的支持，這也顯示葉門內戰不只是國內層面的問題，也是區域安全考量下的一環，同時兩者層層相扣。

而這樣內部衝突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發生，葉門長期以來一直都受到區域分裂和動蕩的影響 (Day, 2012)。在 1950 年代，當時的北葉門王國境內也是出現了挑戰時任王室政權的勢力，其在當時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要求王室政權進行改革。面對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挑戰，王室政權的態度從涵納與利用轉變成抗拒與排擠的態度，於是到了 1962 年，改革勢力在長年發展下認為唯有建立共和才能進行國家的現代化改革。因此，原本在北葉門的王室政權就被軍官勢力所推翻，建立共和政府，同時這股勢力的背後支持者就是埃及的 Nasser (Gamal Abdel Nasser) 總統 (Dresch, 2005)。然而王室方面也在葉門北部高地部族與沙烏地的支持下，對共和政府進行反制。當進一步在區域層次進行討論時，則可以看到在冷戰的影響下，中東地區也被分為兩股勢力，分別為受蘇聯支持的泛阿拉伯社會主義陣營，以及由美國支持的傳統王權陣營 (MacQueen, 2013)。

這兩股勢力分別以不同的認同建構在區域間進行權力與影響力的角逐。埃及為當時泛阿拉伯主義陣營的代表，強調具阿拉伯民族色彩的社會主義路線並呼籲阿拉伯民族的團結並抵抗帝國主義的勢力。另一方面，沙烏地則會強調以伊斯蘭做為區域團結的基礎，而非以阿拉伯民族做為區域團結的認同 (أحمد والسرحران, 2008)。這兩股勢力在意識形態以及權力的角逐，也反映在沙烏地和埃及在 1962-1967 年間於北葉門內戰的參與上，分別支持帶有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王權色彩的共和政府與王室。最後，埃及在葉門的大力參與並消耗過多的實力，更是造成後來泛阿拉伯主義的衰退原因之一 (Rogan, 2011)。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

其軍事行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2015 年 3 月開始的果斷風暴行動，第二階段為 2015 年至今的恢復希望行動。

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不單單只是葉門內部不同團體之間的衝突，外部行為者也參與其中，使得葉門成為了反映了區域強權之間的角力的場域。

當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兩個時期區域強權之間的競逐，如同前述，其也分別反映了某種認同或意識形態上的競爭。例如在上述的 1960 年代，當時中東地區普遍存在一股泛阿拉伯主義的氣氛，並以埃及的 Nasser 總統為首 (Hourani, 2010)，批評親西方的傳統王權。另一方面，受 Nasser 不斷攻擊的傳統王權也連成一線，也試圖建立伊斯蘭的論述進行抗衡 (Menoret, 2017)，使中東地區被劃分成兩個陣營。另一方面，而現今沙烏地和伊朗之間也有以教派作為劃分的勢力競爭，其中有「當代」什葉和遜尼的競爭，可溯源自 1979 伊朗伊斯蘭革命。在革命之後，伊朗就不斷挑戰沙烏地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兩者的衝突不僅僅是在物質層面上，從認同的方面來說，兩者之間也是形成如同軟實力的競逐 (Mabon, 2018)，而這樣的情形更是在 2003 年後加劇，由於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權力真空，促使沙伊兩國進一步角逐區域領導的角色，這也使得教派競爭的論述框架被予以強化，於是中東地區的衝突出現了教派化的傾向。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由於中東國家殖民歷史的緣故，其疆界多為人工劃界，因此這些疆界未能與認同的疆界形成一致，使得這些國家往往會面臨內部不同分裂的團體競爭，而這也使得分析中東地區的國際關係時，認同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Hinnebusch, 2009)。另外，在中東地區也存在許多跨越國界的認同，這些認同因此會在不同的國家內部相互呼應。因此國家在面對這些內部不同認同團體的競爭時，其所採取的互動模式和關係也會影響到區域層次。所以，有鑑於認同對於中東地區的重要性，本篇論文欲從認同角度切入探討這兩次的葉門內戰，檢視葉門內部不同的認同，以

及它們彼此之間的競逐和角力。此外，這些不同的認同團體間的競爭，又如何影響到外部的層次，進一步促使外部行為者介入？而外部行為者的介入又會對葉門內部產生何種影響？最後，本篇論文也會從認同的角度進一步的對兩次的葉門內戰進行比較，討論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這種認同層面的內外拉扯是否有其發展上的延續或改變，以便能從時間的縱軸上，更完善地進行討論。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對葉門內部衝突的發生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而透過對內外行為者的探討，也能將葉門問題鑲嵌在區域的脈絡內，而非將其視為單純的葉門內部衝突。除此之外，這也我們能從不同角度呈現葉門內部衝突，檢視葉門內部分裂的環境如何影響區域行為者間的角力。另外，透過對認同的探討也能釐清這些內外部行為者對於自身利益的界定與行為的動機。而為達成此目的，本論文研究問題欲探討在兩次的葉門內戰中（1962/2014），認同如何影響了內外部行為者，以及行為者對於認同的形塑和建構。為了更深入的探討此議題，本文將針對下列三個層面進行討論：

1. 探討兩次葉門內戰時，其內部各種不同的認同分歧，以及不同認同團體彼此之間如何互動？
2. 內部與外部行為者如何透過認同形成相互回應的關係？內部層次與外部層次對彼此的作用力為何？
3. 從時間的縱軸作切入，探討兩次葉門內戰期間，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上述這種互動關係的有何變化和延續。

透過對這三個子題的分析，能更確定在中東地區殖民遺緒的人工疆界下，各國境內認同分裂與不一致對葉門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能確立葉門內部本身長期的分裂狀況，又是如何了提供區域行為者認同競逐角力的場域與動機。

第三節 名詞界定與概念釐清

本文將探討 1962 年與 2014 年兩次的葉門內戰，其中由於事件背景較為繁複，因此有必要將以下的名詞和概念進行定義與釐清，以便本文進行後續的探討：

一、行為者

在行為者的方面，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兩次葉門內戰中的區域與內部行為者。首先是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當時主要的內部行為者為共和政府與王室兩方。共和政府系指由軍官 Abdullah al-Sallal 領導所建立的葉門阿拉伯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 YAR)，其背後支持勢力主要為 1950 年代以來的改革派份子，以及 Shafa'i 部族派系的商人集團²等(Sooke, 1978)。另一方面，王室則是指至此統治葉門的 Zaydi 什葉派王權³，背後也有葉門北部高地傳統部族的支持(Dresch, 2005)。此外，當時的王室本身的成員也被稱為所謂的 Sayyidis (Dresch, 2005)。在區域間，當時則有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兩國的介入。埃及此時是共和政體，總統為 Gamal Abdallah al-Nasser，其為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領導人物，另一方面沙烏地則是以王權統治為主(Orkaby, 2010)。

而在 2014 年的內戰，內部層次上本文主要鎖定分析的對象為轉型計畫中的政府與胡賽武裝組織(Houthis)兩者。轉型計畫政府為目前主要受國際承認的葉門

² Shafi'i 為葉門境內主要的地方派系勢力之一。其主要以商人集團為主，在政治上因其財力的關係，具有一定影響力。過往 shafi'i 勢力與北部高地的傳統不足即有不合，這反映在過往對於行政與政治資源畫分上(Day, 2012)。而在 1962 年時，shafi'i 商人集團是支持共和政府一方，期望改變舊有局勢，然共和政府所強調的中央集權與社會主義路線讓 Shafi'i 商人集團與共和政府機產生嫌隙(Sooke, 1978)。

³ Zaydis 曾在 17 世紀時就曾驅逐鄂圖曼帝國的勢力統治葉門，然而鑒於葉門的分裂性，Zaydis 並未能完全統治葉門。但在 1918 年 Imam Yahya Muhammad 宣布北葉門王國(Mutawakkilite Kingdom of Yemen)的獨立 (السوفيت، 1990)。

政府，由阿拉伯之春前擔任副總統的 Hadi 所領導(Lynch, 2016)。Houthis 主要為葉門自 1990 年代以來的 Zaydi 什葉派運動，其運動主旨在地方層次上帶有宗教色彩，並一改早期 Zaydis 和沙烏地的密切關係(如在 1962 年葉門內戰中，沙烏地是支持 Zaydis 的)，反對沙烏地在葉門境內的宗教影響力，並以 Zaydi 什葉派的宗教文化權為主要訴求(Hill, 2017)。Hadi 政府與 Houthis 在轉型計畫中無法針對政治安排產生共識，遂有後來的衝突發生。在區域的層次，本文則鎖定在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兩國。沙伊兩國在區域層次上具有相當的競爭，他們對葉門的介入也產生不小的影響。

二、泛阿拉伯主義

泛阿拉伯主義在 1950 年代時，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下達到高峰的阿拉伯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為當時埃及總統 Nasser。其主要訴求為追求阿拉伯民族⁴的團結(甚至一度追求阿拉伯民族建立統一的國家)，並以社會主義為路線(然其並非蘇聯當時所採取的社會主義，而是一個具有阿拉伯民族色彩的社會主義路線，對於宗教的態度較為不同)，反抗區域內的殖民勢力。在此思潮的引領下，敘利亞與埃及曾短暫結合成一個國家(United Arab Republic, UAR)，但在三年後解散。泛阿拉伯主義的思潮在 1960 年代(特別是六日戰爭後)，便逐漸衰退，隨後在 1970 年代伊朗伊斯蘭革命與石油經濟的發展下，可見到伊斯蘭認同的逐漸強化(Rogan, 2011)。

三、認同

本文闡述認同時主要以國際關係中建構主義的角度出發去討論不同行為者認同的建構，並探討不同行為者如何界定自身利益，其認同範圍含括自我認同、

⁴ 本文這裡民族的概念將界定在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因此阿拉伯民族在這裡為一種共同的社會建構。

角色認同與政體認同等(Wendt, 1999)，而認同本身會界定行為者的利益與動機，而環境與結構則會進一步塑造行為者的認同。另外，本文也需特別界定意識形態與認同的差異，其中意識形態是屬於一種由上而下的塑造，是為達成特定目標的工具(Telhami and Barnett, 2002)。而認同則是一種雙向的建構，無論是結構層面或個體層面皆具有形塑的力量(Telhami and Barnett, 2002)。

四、認同的安全困境

本文特別使用 Mabon (2018)的概念來進行分析架構的建立。其中，他特別將認同與安全困境的概念結合。然而，這兩組概念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分別屬於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範疇，其結合尚需進一步討論。因此 Mabon 特別提及，其將認同劃入權力的範疇，認為國家會利用認同作為權力角逐的手段，來增強自身的正當性與影響力。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認同的競爭也被視為權力的競爭，於是認同的相互排擠便有形成安全困境的可能。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此篇論文欲從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兩次葉門內戰中，葉門內部與區域強國之間的互動關係，而為了顯示認同在中東地區政治的重要性，本文有必要先對認同在中東地區政治上有何影響力進行探討，以確立從認同進行討論之基礎。故以下部分文獻，將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對認同的議題進行回顧，再來是對兩次葉門內戰的經過進行爬梳。其中針對認同的議題將分為認同和外交政策、認同和國家形成以及跨國界認同和規範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後兩者為認同對國家自身與其所屬環境的結構性影響，而認同和外交政策的關係則可以顯示認同具有影響不同行為者動機的作用。而在針對葉門內戰的文獻回顧進行探討時，將依照發生年份

的先後順序分別對 1962 年和 2014 年的內戰研究文獻進行討論，以釐清兩者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發生脈絡。最後，筆者在文獻回顧後，發現葉門本身在認同議題上的重要性，其本身的破碎性對認同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而另一方面，從認同的角度對葉門進行檢視，也可以更完整的去解釋不同內外部團體的互動模式和動機。

一、 認同與中東國際關係

由於中東地區各國的國界為人工形成，其在分界上與許多不同認同團體的分界線並不一致，造成各國境內有時會有不同認同團體的存在並可能產生競爭，國家在整合上因此會遭遇挑戰(Hinnebusch, 2009)。而為釐清與爬梳認同在上述情況下會對區域政治形成何種影響，本文以下將分別針對認同與外交政策、認同和國家形成以及跨國界認同和規範三個方面對過往文獻進行爬梳，以期更能釐清認同於中東地區政治關係中的重要性。

認同與外交政策

在傳統的國關學界裡，似乎對認同所扮演的角色有所爭辯。以結構現實主義來說，其觀點忽略了國內組成要素，許多這類學者都把國家的利益視為一致的。在這樣的脈絡下，他們認為中東地區的衝突還是以權力政治的因素為主要原因。這種系統取向的途徑，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並解釋了許多中東的事件，但其在外交政策上針對特定事件的解釋力不足夠，如沙烏地為何不能直接公開地與以色列結盟等(Telhami and Barnett, 2002)。因此 Telhami 和 Barnett(2002)從建構主義出發，探討了國家利益的社會建構，同時也討論了主權作為一種跨國政治間原則的出現、阿拉伯和主權規範對領導者間互動之影響，以及由國家認同的轉變所帶來的國家利益轉變，而共同的認同可以導致衝突或合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認同會界定國家的利益並影響其行為，而不同行為者在認同上的衝突或協調，則會帶來其合作或衝突的結果(Telhami and Barnett, 2002)。此外，這也顯示了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並不單純將其視為追求生存的一種策略，也是追求某種社會的或意識形態的利益(Akbarzadeh and Barry, 2016)。另外，認同也有可能被政治菁英用來作為權力競逐的工具，發展其規範性的軟實力。然而由認同驅使的外交政策之長期結果，會受這些這些行為者之間的認同以及物質層面上的權力平衡兩者間是否一致影響。因為物質層面上的限制，可能會對政治菁英所建立的認同造成挑戰。例如，以色列的軍事實力，會對泛阿拉伯主義的外交政策造成限制(Hinnebusch, 2009)。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認同在中東地區國家外交政策的形成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除了物質利益上的考量外，認同與規範也常被國家用來作為利益與權力競逐的工具，同時也能提升自身在區域層次上的影響力。從前述的討論可以看到認同影響了國家對於自身利益之界定，在不同的認同下國家可能會追求不同的利益，因此也可能影響了不同國家之間的衝突或結盟。而本文所探討的兩次葉門內戰期間皆在區域間有不同認同競逐的情形，而這些認同也驅使這兩段期間內不同行為者的互動與利益界定，因此可以看到不同國家或是行為者沿著某種認同分歧的界線進行競爭。

認同和國家形成

綜觀歷史，在中東地區一直以來有各種不同的認同影響國家形成的過程。因此宗教或是種族認同的復興或衰退，會影響或形塑了那些已建立的或仍在形成中的國家。而國家在形成的過程中，對於要如何整合這些認同則遇到了挑戰(Masad and Christie, 2013)。然而，在探討認同和國家形成前，有必要對認同和意識形態

的區別做定義，以便確立意識型態和認同這兩種概念的分野，並進一步確認認同對國家形成的影響。有關認同和意識型態的差別，可以從根源與功能來區別認同和意識型態。意識形態的概念是從馬克思主義者發展而來的，他們認為意識形態是用來解釋宰制如何藉由最小的直接力量來進行再生產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意識型態會使個人做出的行為違反其在物質的社會結構中所擁有的利益，因此意識形態是服務宰制階級的利益，而不是被宰制階級的客觀利益(Telhami and Barnett, 2002)。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意識形態更像是一種工具，為主宰的階級（強權）獲取物質上的利益(Telhami and Barnett, 2002)。而 Telhami 和 Barnett(2002)在此則是認為，認同是指一個行為者藉由對他者的關係來理解自己。在某種制度的脈絡中，行為者透過互動和參與來獲得某種認同。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特定認同的建構會導致國家對利益解讀的不同，並改變影響國家行為的規範結構(Telhami and Barnett, 2002)。

由上述討論可以看出，認同對國家利益界定的影響，而國家認同的建構也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中東國家中，認同和領土之間的差異和不協調，會在國家菁英建立國家認同時帶來挑戰，特別是來自那些跨越國界認同的挑戰，如泛阿拉伯或泛伊斯蘭認同(Hinnebusch, 2009)，這些認同也有可能在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相互競逐。除此之外，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和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分歧，也可能會使國家在加強認同的過程中帶來衝突和角力。而在國家認同建構的起源中，有三種可能的力量，分別為政治菁英或工具性的力量，社會性的力量，以及國際性的力量(Telhami and Barnett, 2002)。而其中，政治菁英在建構國家認同時，會以國家為中心，試圖調和這些認同。而這些跨國家的認同雖然可以給予統治者正當性，但在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等物質層面上的限制，卻有可能傷害了他們的正當性。如以色列的軍事實力相對其他區域國家較為強大，使阿拉伯國家在無法挑戰他的情況下還必須適時向內展示對抗以色列的

決心，此外許多國家對美國的依賴也未必能獲得其人民的支持(Hinnebusch, 2009)。而阿拉伯之春的爆發，也揭露出了過去國家認同的脆弱性，並使得宗教認同的強度提升。目前為止，根據 Masad 和 Christie(2013)，並沒有國家成功地發展出一個國家認同能去包含這些不同的認同。

跨國界認同和規範

根據 Hinnebusch(2009)，他認為認同在中東國際關係中扮演了很特別的角色。中東地區有兩個重要的特別之處：首先是宗教和種族在構成政治認同上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第二則是物質層面和認同層面的不協調——國家領土和國家認同之間的差異，以及區域規範和國際施加的結構之間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是造成中東地區衝突的原因之一。而根據 Telhami 和 Barnett(2002)，在兩種情況下，國家可能會面臨衝突：首先是對集體認同的定義有競爭時，且這些競爭的定義要求著不同的角色或行為。再來是當集體認同在新的歷史框架下不被接受時。換句話說，就是當國家的認同和更廣泛社群的認同不相符時，這樣的不協調就會帶來衝突。上述的情形也顯現出在中東地區，可能存在著跨國界的認同和規範力量，使得國家認同在建構的過程會牽扯到區域的層次，因為跨國界的認同會和國家認同產生競逐(Telhami and Barnett, 2002)。然而中東地區跟其他第三世界地區不同的是，領導者需要將想像的共同體或規範從跨國界的狀態縮小，並限縮在國家的疆界中（其他地區則相反），以便試圖建立國家認同(Telhami and Barnett, 2002)。另一方面來說，政治菁英也可能會利用這樣的認同，做為其發展規範性軟實力的工具。例如泛阿拉伯主義或泛伊斯蘭主義。而雖然這些認同在某方面為政治菁英帶來了正當性的來源（藉由將這些跨國界認同整合進國家認同），但當政治菁英所利用的認同與物質層面上的利益相衝突時，則如前述所提到的可能會為這些政治菁英帶來正當性的損害(Hinnebusch, 2009)。

若以阿拉伯之春前後的中東地區為例，Malmvig (2014) 也有提到，無論在 2010 年前或後，區域間的規範是對區域間政治的重要限制或驅動力，並以所謂 Resistance Front (伊朗、敘利亞、真主黨和哈瑪斯) 為例，認為他們在阿拉伯之春前，建立了一定以反以色列和反美意識型態為主的規範性力量，足以影響許多中東國家內部的政治。然而這樣的規範性力量在阿拉伯之春(特別是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衰退，而所謂規範力量的本質正在改變，一些關於統治的正當性或是政教關係的議題正在成為新的討論中心，而遜尼和什葉之間的分野，可能也會取代以巴衝突，成為區域內最重要的議題。

回顧了以上文獻過後，不難發現認同的議題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性。認同在此地區與國家疆界形成一種不協調的關係，不同認同的競逐會在不同國家的內外部進行回應而互相影響，因此，認同也影響了外交政策的制定。由於中東國家上述提到的特殊性，其國家認同的建構往往得面對內部不同認同的挑戰，而這些認同也可能形成區域間跨國界的認同，進而形成前述提到的一種內外相互回應的結構。然而上述文獻對認同的探討中，幾乎無針對葉門的個案進行探討。由於葉門長期以來即面對內部不同的分裂，這顯現了其在國家認同上的破碎，而區域強權過往的介入，如埃及和沙烏地，也顯現出一種內外互相回應的關係。而相較其他區域內的國家，葉門較缺乏一個強勢中央權威，因此藉由對葉門的探討，能更加瞭解葉門內部破碎的結構對於這樣的認同分歧，以及內外認同團體和行為者的影響。

二、 葉門內戰

如同前述，葉門相較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相較對薄弱，區域主義盛行。也因此，若從認同的角度去探討葉門，更能去探究葉門的破碎和分裂對於葉門內部的認同形成和互動有何影響，並且藉由其和區域內部跨國認同

互動的討論，能進一步理解其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互動關係。因此，以下將先對過往文獻針對葉門內戰的討論進行回顧，以理解其內戰之發展脈絡。

1962 年葉門內戰

在 1950 年代時，埃及的 Nasser 總統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然而在 1960 年代時，一連串的事件導致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衰退，而葉門內戰為其中一主要事件。在 1960 年代，Nasser 強化了基於阿拉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改革，產生所謂阿拉伯社會主義。而阿拉伯社會主義也分裂了阿拉伯世界。Rogan(2011)認為，在埃及的政治語言此時期變得更加教條化。Nasser 同時也批評那些傳統保守王權為所謂的反動者，如約旦、摩洛哥和沙烏地阿拉伯等，而如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等遵循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Nasser 則稱之為進步的國家(Rogan, 2011)。

而在 1962 年的政變後，葉門內部衝突也反映了這樣的區域分野，形成代理人戰爭(Dresch, 2005)。早在 1955 年時葉門的王室政權就越來越懷疑 Nasser 在葉門的影響力，尤其是其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制度的意識形態，擔心這會影響到他統治的穩定。然而，葉門和埃及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直都是敵對的，例如其曾也就反英國的立場達成一致。而針對前述所提到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葉門王室對其大力批評，認為國有化財產的動作是違反伊斯蘭法的。這樣的言論也激怒了 Nasser，他進一步批評葉門政權為所謂反革命的「反動者」，呼籲人民起身反抗(Rogan, 2011)，因此在 1962 年由軍官發動政變後，埃及也支持這場政變。根據 Rogan(2011)，埃及在葉門的參與是一種政治性的考量，尤其是對 Nasser 而言，更是擴張其影響力的一個決策。另外，對沙烏地而言，埃及在其邊境支持的革命是一重大威脅，所以支持被推翻的王權份子(Dresch, 2005)。在這樣的情況下，葉門內戰呈現出了當時阿拉伯世界的分野，由沙烏地所代表的傳統阿拉伯王權和埃

及兩個勢力互相競逐，葉門內戰也演變成兩個陣營，與上述提到的區域間「進步」和「反動」之間的分野相同，葉門內戰演變為代理人戰爭的場域(Dresch, 2005)。

然而儘管 1962 的葉門內戰演變成沙烏地和埃及之間的代理人戰爭，根據 Dresch(2005)，葉門內部支持王室的部族，不一定代表其對所謂王權體制的支持，更多是對共和政府的不信任所導致。埃及政府的參與，也未必能得到當地勢力和人民的支持，更多的是埃及政府對葉門內部直接的控制，這顯示了葉門內部行為者也未必和支持他的外部行為者相契合

若是跳出所謂「阿拉伯冷戰」⁵的思維下進行對 1962 年葉門內戰的探討，也可以發現這次的內戰不僅是區域強權進行角力的代理戰爭，也是葉門內部部族和現代國家認同的競爭，另外也是葉門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Orkaby, 2017)。因此除了外部因素的影響外，葉門內部也有自己的動力，這些動力多是關於葉門的民族主義、國家建構和泛阿拉伯思想的團結和語言。此外，埃及和沙烏地在葉門的競逐不僅是受到意識形態的驅動，同時也包含了歷史性的衝突、地緣政治利益、宗教以及地方勢力等因素的驅動。而透過對多方行為者的探討，能對此場衝突建立全面的探討。最終，這場葉門內戰沒有一方能單獨主導內戰的最後結果，無論是外部或內部的行為者(Orkaby, 2017)。

而若從葉門內部的角度來檢視的話，Day (2012) 也有對葉門內部政治問題做檢視。他從區域主義的角度去切入探討葉門內部的分裂問題。根據 Day，葉門各地區的分裂和區域主義，是葉門長期動盪的原因之一。而在進一步向內檢視的話，可以觀察到葉門內部的破碎性。葉門中央權威受到地方的挑戰，特別是在北

⁵ 中東地區也受當時全球冷戰的影響。美蘇兩國也在此區域爭取支持，故該地區也被劃分為親美與親蘇兩個陣營，親蘇一方可由後來的埃及為代表，親美一方則可以約旦和沙烏地等王權國家為主要(Orkaby, 2017)。

部。Day 曾提到地方部族的權威對中央的挑戰，並以在北部高地的 Hashid 和 Bakli 兩族為例，其各自有自己的司法系統，獨立於中央的司法體系之外。而長期以來，葉門的統治者也透過巧妙的政治操作，在這些區域分野之間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看到，若是只從內部政治問題和物質層面的角度來看，對葉門內戰的討論會比較侷限。因為認同可以界定不同政治團體的身分利益，因此藉由對認同的探討，可以更全面的了解這些不同區域團體間的互動關係和目標，更能瞭解不同政治團體在其行為上的認同因素，以便能對葉門內戰的發展有更全面的認識。而若從區域的層面來看，在 Rogan 的討論中，他有提到原本葉門王室政權和埃及在區域內進行某種認同上的衝突，即是伊斯蘭的認同和阿拉伯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但對於無論是葉門的王室政權，或是埃及的 Nasser 政府為何會產生這樣認同上的衝突，又或是這樣的衝突會對內外團體的互動產生怎樣的意涵，Rogan 則沒有進行太多探討。在此要將葉門內部和區域的外部行為者連結討論，這樣的討論可以將葉門置於區域的層級下進行檢視，將葉門內戰的發展鑲嵌於更廣泛的區域脈絡下。而當我們進一步探討內外部行為者間的互動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次國家行為者和外部強權之間的關係變化。而在認同層面上，Dresch(2005)有分別討論了當時不同的葉門國家認同建構，而筆者在本文則是要延伸探討，在這樣的建立過程中，葉門的內部認同有哪些分裂，這樣的分裂在葉門政治甚至更廣泛的區域間政治上，有怎樣的驅動力？由於認同會界定行為者的利益和動機，而行為者間互動也會影響認同的建構，在這樣的情形下，透過對認同的討論，我們可以去檢視這些認同背後所反映的政治關係，無論是內部的或是區域的，也能將葉門國家認同的建立過程，以認同作為連結，放在更廣泛的歷史脈絡中進行討論。

2014 年葉門內戰

傳統上葉門政治的不穩定和以下三個因素有關：威權的政治系統、部落的認同以及區域強權的競逐(Pradhan, 2017)。葉門的統治者長期以來就透過平衡各地方勢力來治理葉門，而阿拉伯之春的爆發則代表了 Saleh 過去所維持的平衡崩解(Day, 2012)。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之春也為葉門帶來一種跨越教派與部族的集體認同，追求葉門做為一個國家的必要改革。然而在阿拉伯之春後，GCC 針對葉門政治轉型的計畫遭到許多反對，Houthi 與 Salafi 之間的衝突持續，而原先在阿拉伯之春時，那些反對葉門舊政權所建立起來的集體認同也因此消失了(Day, 2012)。另外，Day(2012)也認為 21 世紀的葉門政治主軸並不在宗教、意識形態和階級等等層面上，而是在所謂的區域主義上。過去那些泛阿拉伯主義者和傳統部族份子間，或是伊斯蘭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間的爭執已經消逝。而自 1990 年代起，葉門政治不穩定的主要來源即是不同區域團體針對政經資源的競爭，這也使得葉門至今仍舊是一個破碎的國家。

儘管 Day 認為現今葉門內部的政治主軸在於區域主義和對資源的競逐上，Pradhan(2017)和 Stacey(2017)卻也指出了葉門衝突的教派化。教派的認同過去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相對較小，僅侷限在政治菁英的範圍內。然而，自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後，教派的認同上升，衝突也更朝向教派化發展。當 Houthi 在 1990 年代成立時，即是針對沙烏地的影響力進行反抗，特別是沙烏地的瓦哈比主義。此外，屬於 Zaidi 什葉派的 Houthis 也抗議政府長期忽略他們的訴求以及沙烏地的在葉門內的影響力(Pradhan, 2017)。Stacey (2017) 則認為，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GCC 所建立的政治轉型計畫是造成葉門內部衝突逐漸教派化 (sectarianization) 的原因。或者更精確地說，由 GCC 轉型計畫制度性的特徵所造成的誤認 (misrecognition)，導致了葉門內部衝突的教派化。根據 Stacey，於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時，年輕的示威抗議運動者之間，透過集體行為產生共和主義

的認同，團結了過去關係不洽的勢力。而此時的反抗是一種集體對現有建制不滿的反抗，衝突並不在於教派之間。然而，Stacey 認為，政治菁英在面對 Houthi 政治和文化權利的訴求時，常以教派衝突的語言去框架議題。此外，如前所述，GCC 所建立的轉型計畫，透過排除特定團體的參與，也制度性的進行這樣的框架過程。最後綜上所述，形成了葉門內部的教派化動力。

從內外關係的角度來看，Pradhan(2017)也分別提到了沙烏地和伊朗在對葉門政策上的考量。對沙烏地而言，傳統上沙烏地對葉門的政策即是維持一個相對虛弱的葉門，使其在經濟上依賴沙烏地。此外，沙烏地也透過資助許多有影響力的部族，滲透其影響力，並形成一個宗教的網絡。但現今葉門如此不穩定的情況下，沙烏地則將葉門的穩定視為政策的首要目標，以確保邊界的安全，而沙烏地將 Hadi 政權的穩定視為達成葉門穩定的重要基礎。此外，Houthi 過去就與沙烏地發生不少衝突，長期以來，沙烏地也一直將 Houthi 視為伊朗的代理人，而這樣的認知也使得這場衝突更朝向教派化發展。在伊朗方面，Pradhan 認為 Houthi 有受到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啟發，而在思想上有發揮影響力。而伊朗也對 Houthi 採取較同情的立場，批評沙烏地採取的軍事行動，認為支持 Houthi 在地緣政治上有相對的優勢。然而，無論是伊朗或是 Houthi 都否認彼此之間有直接的連結，而目前也沒有特別的證據指出他們之間有直接軍事的支持(Pradhan, 2017)。目前較為確定的是伊朗對 Houthi 的支持多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從內外關係的另一方面來看，Day(2012)則從在葉門建立穩定的政治體系出發，認為葉門內部的分裂會雖然需要外部勢力的協助，以便進行統合，但這些外部勢力必須節制自身，避免對葉門政治的未來結果進行干預，或支持不同的區域團體。政治協商的過程終究須由葉門內部出發，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體系。

如同前述對葉門 1962 年內戰的討論一樣，針對阿拉伯之春後葉門內部的衝突發

展，若是只從內部政治和物質層面來探討，會有所侷限。而雖然 Day 認為 21 世紀的葉門政治主軸不在宗教或意識形態上。但隨著葉門在 2014 年後爆發內戰，Pradhan 和 Stacey 都有指出葉門衝突的教派化現象。因此，透過對葉門內部不同認同分野和內外行為者間互動的探討，也可以對這樣一個教派化的過程，有更完整的認識。而在 Stacey 的討論中，似乎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探討當權如何透過一種工具性的制度，去形塑葉門的衝突，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途徑去解釋。而此篇論文想探討的則是葉門內部的認同如何形成，以及政權如何針對這些認同做出反應，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過程，並進一步探討這樣的互動過程如何影響了區域強權的行為。在這樣的探討中，各種不同的認同團體在其認同建構上有更大的能動性，而非單單是受某種制度所宰制的對象。此外，Pradhan 在這裡有對葉門在 2011 年後的情形有做了內外部的探討，也討論了葉門內部教派認同以及衝突教派化和外部強權之間的關係。但在他的討論中，並未提及為何內外部行為者的認同會產生這樣的互動模式，以及認同如何界定了這些不同行為者間的利益，以便能為這樣的互動模式產生，提供更完整的解釋。

上述的文獻多有提到葉門內部的衝突為區域間強權競逐展現，並針對這些強權之間的競逐做探討。另外，有不少文獻也探討了葉門內部的行為者和區域強權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筆者也發現，儘管這類文獻有從內外角度針對區域強權葉門內部之間進行討論，其討論多注重在物質因素的層面上，或是從比較宗教或政治的意識形態角度探討葉門內部和區域之間的關係，同時少有針對認同層面的探討，並進而去檢視葉門內部的分裂具有那些認同，以及這些認同的互動如何影響區域層次的互動。鑒於前述提及認同在中東國際關係上的重要性，認同會影響不同行為者的行為也界定了他們的利益，同時也影響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中東地區認同和疆界的不協調，也影響了內外行為者的互動。是故從認同上去探討葉門和區域間強權的關係便顯得重要。藉由認同角度上的探討，可以更完整的去

了解葉門內戰時不同行為者間的互動關係和動機，對於葉門內部衝突為何產生能有更完整的認識。同時，本文也會比較兩次內戰在認同層面上的變化，藉由這樣的比較，能更加理解葉門認同的議題在時間的縱軸上的延續和變化，以便能對葉門長期以來的動蕩和分裂提出更全面的理解。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文獻分析

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的方式進行非介入式的研究，蒐集過往官方或非官方的文獻、聲明或檔案等來獲取研究資料，並進一步分析不同認同團體的建構，以及在葉門內戰中，這些認同團體和外部行為者的內外互動，最後建立完整脈絡關係，以便能對事件有更完整的認識。

二、比較分析

由於兩次葉門內戰時，其時空環境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改變，例如葉門統一的認同在 1960 年代時還尚未發展成熟，因此若能在不同時空環境將兩次葉門內戰的發展進行比較，也能使得對於認同在葉門內戰中的討論形成一種延續的探討，更能釐清在不同時空背景下，認同是如何在不同行為者間進行驅動的作用，也能將這樣的探討進行進一步的深化。所以本文也將使用比較研究的方式，在時間的縱軸上比較 1962 年和 2014 年的葉門內戰，其中 1962 年的葉門內戰可以說是影響了葉門在現代國家形成上的重要事件，在此之前，葉門則是長期置於王室的統治之下。而 2014 年的內戰則是葉門最近期的內戰衝突，因此透過這兩場內戰的比較，則可以從葉門現代國家形成上初始和現今的兩個端點，探討對葉門內外部

不同認同團體間的互動發展的延續和改變，以便能從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瞭解此議題。

三、 分析架構

而本文將以國際關係領域的途徑，建立本文的分析架構。首先，筆者回顧有關現實主義的文獻，根據古典現實主義的論點來看，其將國家視為單一且一致的行為者，並將利益以權力去界定，並且注重權力平衡的分析（Morgenthau, Thompson & Clinton, 2006）。然而，國家並不一定是單一且一致的行為者，尤其是在一致性方面。以中東國家為例，其內部的認同相當分裂，國家的集體認同與地區的認同競逐，造成國家的行為有時可能難以用一致的角度去檢視。同時，古典現實主義者也較忽略國家內部認同層面的因素。

而若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去檢視，則其較重視國際體系等結構層面的影響力，將權力平衡視為體系運作下的必然結果（Waltz, 2010）。然而，與古典現實主義者相同的是，新現實主義者也將國家視為單一且一致的行為者，在分析上又會遭遇上述的問題，同時，新現實主義也似乎過度強調結構對行為者的制約，並且也忽略了認同層面的因素，筆者認為若要在這探討國家內部分裂的影響，是比較難採用新現實主義的途徑的。而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觀之，其將國家內部的因素做為中介變項，調節來自系統層面的輸入項，最後在單位層次上產生結果（Rose, 1998）。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對認同的探討，似乎在此與筆者所要探討的認同競逐不太契合。

而若是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Wendt（1999）特別從認同的角度著手，雖然同時並沒有忽略物質層面的因素，但他強調，物質層面因素之所以發生作用，

其原因來自國家的認同驅動。他認為體系和單位層次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並強調單位之間互為主體的認識和建構，認為現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彼此互動而建構出來的。然而，若是採用 Wendt 建構主義途徑，可以發現其適用在中東國際關係，特別是在葉門上，會發生問題。根據 Wendt 的論點，其認為國家具有一個單一的集體認同，國家內部似乎是在這樣一個集體認同之下。然而以葉門的例子來看，其內部具有不同的認同在競逐，並缺乏一個較主導的集體認同，因此在適用 Wendt 的途徑上，也會發生問題。

根據 Lynch (2016)，針對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地區的區域秩序，他從安全困境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一個系統性的討論。在阿拉伯之春後，許多國家陷入所謂失敗國家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區域強權之間的競逐延伸至這些失敗國家的內部，形成一種「內部—外部」的安全困境，亦即當一個國家在這些失敗國家內部投射其力量時，會引來其他國家的不安，進而相繼的投射其力量。從另一方面來說，中東國家也謹慎防範革命滲透進自己國家內部，避免外國對國內影響力的提升。在這樣的脈絡下，Lynch 認為葉門即是區域內部失敗國家的一例。而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以沙烏地為首的 GCC 國家就積極的介入，提出所謂政治轉型計畫，試圖建立穩定的政治安排。然而這樣的安排卻是失敗的，而原位於北部的 Houthi 勢力在 2014 年 9 月攻進首都沙那。Lynch 特別提到，Houthi 的擴張不單單是伊朗擴張主義的影響，更多是 GCC 原先轉型計畫結構性的失敗所導致。無法有效地排除舊勢力，以及未能有效融入地方勢力都是此轉型計畫失敗的原因。

此外沙烏地決定積極的參與葉門事務，其原因根據 Lynch，是基於區域間沙烏地和伊朗之間的競逐的結果。在彼此競逐的脈絡下，沙烏地視 Houthi 為伊朗的代理人，也不斷的將 Houthi 框架在伊朗支持的代理人的框架下，儘管並沒有實質的證據顯示伊朗對 Houthi 有軍事上或實質上的支持（其支持多是政治性

的而非軍事的)，在這樣的認知下，沙烏地進行軍事干預被其認為是對伊朗野心的基本回應。

而根據 Mabon (2018)，他則提出了一個結合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框架，並將認同視為權力的一部份，將其放進安全困境的架構中，去探討認同的分裂對於中東區域安全的影響。他特別提到了一個內部—外部安全困境的概念。這樣的概念在 Lynch (2016) 的文獻中也有提及，認為在中東國家，其內部的分裂形成了一種內部的安全困境，而這種內部的安全困境也接連著回應了區域間的安全困境，形成了一種跨越國境的安全困境。然而在 Lynch 的探討中，其較沒有探討認同的作用。而在 Mabon 的討論中，他特別融合了認同的因素，認為中東國家的領導人，常常會透過民族主義和宗教意識型態的操作，去建立集體認同，並在區域間形成不同認同的競逐。而這樣的競逐也存在於國家內部，其有不同的認同團體在競逐國家認同正當性，而這對國家而言會形成一種內部的安全困境，其對不同認同團體的擠壓，會激化這種認同的競逐。此外，由於中東國家劃界的特性，這些認同有時也會成為跨越國界的認同，因此內部認同的競逐會牽連到外部國家間認同的競逐，形成一種由認同的分裂所倒致的內部—外部的安全困境。意即國家對內部的某些認同團體的擠壓，會威脅到其他國家認同的正當性，進而加劇彼此間的衝突，形成一種內外互相回應的安全困境。

因此本文在此要採用的是 Mabon 所提出的框架。根據 Mabon (2018)，他提出了所謂內部—外部的安全困境的概念，認為中東地區這種人工的國界，會造成內部認同的分裂，使得國家內部會有不同的團體去競爭國家認同的正當性，無論其是種族的或是宗教的。而上述這樣的分裂會引起內部的認同安全困境，政權對於不同的認同團體進行壓迫會激化這種針對認同的競逐。此外，同樣基於上述提到的國界的人工性，國家對內部認同挑戰的回應可能會威脅到另一個國家其認同

的正當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內部與外部的全困境形成，不同國家內部的認同團體和區域間其他國家形成一種互動關係。

Mabon 提出了三個階段去檢視這種由認同分裂所導致的內外安全困境，其分別探討了國家形成等結構問題，以及內部-外部安全困境如何生成和互相影響。分述為以下：

階段一：認同的形成背景

而在第一階段裡，Mabon 探討了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其對規範和認同層面的影響。他認為之所以要探討國家的形成和政治結構，是因為國家形成的過程和政治結構會反應出其所採取的意識形態和規範色彩，而藉此可以進一步的探討這些規範力量對國家內外的影響。此外，Mabon 也討論了區域安全問題。他從認同的角度切入，認為中東地區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是屬於 state-nation(國家民族)，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受到來自於其他跨國界的認同之競逐，這些跨國的認同因此也影響了統治者政權的正當性，因為他們常常透過意識形態或宗教認同來獲取其統治的權威。因此，Mabon 認為區域間的安全是認同的來源和結果。

階段二：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在第二階段裡，Mabon 探討在國內層次上，不同的認同團體和國家認同的不一致，進而產生了所謂內部的安全困境。由於中東國家的人造疆界，造成了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會受到次國家的或跨國界的其他認同競逐。另外，從主權的角度來看，Mabon 也提到了政權通常會在其領土內維持某種意識形態的主宰進而維護其統治的正當性。然而，這些不同認同的競逐卻也挑戰了當權者的權威正當性。其在政治空間受限制的情形下，這些認同團體和當權者的衝突無法透過體制內的途徑進行協調，進而在體制外的途徑挑戰當權者，並在一來一往的過程中形成所

謂內部的安全困境。

階段三：與外部認同安全困境的相互回應

在第三階段裡，Mabon 探討了上述所提到的內部安全困境是如何的影響到外部的層面，進而影響了區域的安全。他認為國家在面對內部不同的認同團體的挑戰時，國家所做的回應會影響到外部的層次，同時也影響了鄰近國家。當國家在回應時，常常會訴諸某種意識形態，來團結內部的認同，並在這樣的過程中，於外部層面上塑造了另外的他者，而這樣的過程也影響了他國內部的安全困境。此外，國家在訴諸意識形態（常常是宗教的或國族主義式的）的同時，也形成了某種軟實力的競逐，一種基於軟實力的衝突和意識型態的競爭所形成的安全困境。例如 Mabon 在此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間，對於伊斯蘭價值的競逐，即是此例。此外，國家也會藉由操弄他國內部認同的不協調來破壞他國國內秩序。

針對如何使用上述架構來進行對葉門的分析，可以整理如下表：

階段 層次	一階段	二階段	三階段
內部層次	行為者認同的形 成背景	葉門內部認同如 何相互競逐	葉門內部認同競 逐如何驅使外部 行為者？介入的 影響為何？
外部層次	行為者認同的形 成背景		

表 1-1 分析架構應用

如上表所示，本文將在第一階段的分析上探討內外層次不同行為者認同的形成背景，並在第二階段的分析中討論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而由於本文欲專注於對葉門的討論，故在外部行為者的內部認同安全困境上，就不多做討論。最後，在第三階段的分析中則會探討內部與外部兩層次的認同安全困境彼此有怎樣的吸引力，去刺激不同內外部行為者做出反應。

而筆者在此也另外融入了比較研究的架構，從時間的縱軸切入，去探究不同時空背景下，上述這種認同分裂所造成的安全困境，在發展上有和延續和改變，在原本的分析架構上在提供時間的維度，並能更加深化對葉門近代衝突的理解。Mabon 所提出的架構雖有透過歷史的角度去探討認同困境的形成，但本文透過從時間縱軸上的比較，能夠將此研究架構更細緻的去應用在葉門問題的分析上，並同時深化本文的論述和發現，並補充 Mabon 所提出架構的深度和廣度。因此，本文在此將運用此架構，去檢視兩次葉門內戰中，其認同層面上的內外互動關係。本文將利用他在階段一和階段二的分析架構，去檢視葉門內部不同認同團體的形成，以及這些不同認同團體的互動過程，如何形成所謂內部的安全困境。並利用階段三的分析，探討葉門內部不同認同團體的競逐如何在區域層次上造成影響。最後，本文也將兩次內戰進行比較，探討前述提到的這種認同層面的互動關係，在發展上的延續和改變。

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為 1962-1967 年間以及 2014-2018 年間，兩次葉門內戰時的內外行為者，其中包含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探討認同如何影響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形成一種內外相互回應的結構。而本文討論兩次葉門內戰時，將以主

要的區域內行為者為限，分別為葉門本身，以及沙烏地、埃及和伊朗，其分別在兩次的葉門內戰中，被廣泛的討論，可見其重要性。另也透過對這兩次葉門內戰的比較，探討其發展的延續和改變。而值得注意的是 1962 年的葉門內戰與 2014 年葉門內戰中的葉門本身，所限定的範圍可能就不大相同。前者發生南北葉門統一前的北葉門境內⁶，而後者則發生在葉門統一後。然而，本文在 2014 年葉門內戰的討論中，也多集中在葉門北部 Houthis 與中央政府的衝突，原因是在 2018 年前，葉門南方勢力多與中央政府結盟，一直到近兩年才可見到南方勢力與中央政府的幾次分裂⁷(Younes, 2020)。

圖 1-1 葉門地圖(CIA Worldfactbook)



⁶ 當時南葉門主要至於英國的統治之下。在北葉門內戰後期，英國才正式離開葉門，南葉門因此獨立，成為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Dresch, 2005)。

⁷ 2018 年後，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支持下，南方勢力曾與 Hadi 政府歷經幾次的分裂，彼此的聯盟並不太穩固。

如上圖所示，2014 年葉門內戰中 Houthis 與中央政府的衝突多集中在北部地區，其中北部大城 Sa'dah 為 Houthis 運動的發源地，並在 2014 年南下圍攻首都沙那(Sanna)。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篇論文在探討認同議題上的一個限制即是無法至葉門或相關國家進行田野調查和訪問，這可能會造成在認同的識別和界定上，因資料來源的問題產生偏誤和偏差。而本篇論文因此會蒐集來自當地或阿拉伯文的相關資料，以便能從當地的視角出發，貼近當地實際的狀況，避免這樣的偏誤產生。

第七節 章節安排與研究成果

本文以下將分別分為四章探討 1962 年與 2014 年葉門內戰中認同與內外層次行為者的互動與作用。首先在第二章中與第三章中，本文將探討 1962 年與 2014 年葉門內戰的發展背景，以及內外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並探討認同對於不同行為者帶來何種動機，而行為者的互動又如何形塑了葉門內戰。隨後在第四章探討 1962 年與 2014 年兩次葉門內戰的比較，檢視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不同的認同如何在葉門內部與區域間帶來衝擊與形塑的力量，並從葉門現代國家史上發展的首尾兩個端點來檢視認同與內外安全困境發展的延續與改變。最後在第五章，本文將針對這兩場葉門內戰中認同內外安全困境的發展做出整理與結論。

而透過本文的討論，可以大致發現 1962 年與 2014 年兩次的葉門內戰中，葉門如同其他中東地區的國家面臨了人工疆界與跨國界認同的問題，此外葉門內部缺乏中央權威的情形易形成不同認同競爭的場域，並吸引外部行為者的介入。在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下，葉門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能力也被限縮，使葉門成為區域行為者認同競爭的場域。此外，也可以看到葉門內部從 1962 年至 2014 年發生

了一些變化，這變化反應在這兩次內戰中呈現的不同認同本質，然而不變的是內外部不同行為者仍還是會透過認同作為角逐權力的工具，也因此會將原本可能在區域間或葉門內部和諧共存的認同，建構出敵對的關係，這可在 2014 年葉門內戰後續衝突的教派化中反映出來。最後，對於未來這場葉門內戰的發展，本文認為只有在外部行為者退出後，葉門本身內部才具有重新和解的可能，並去塑造新的一被葉門人廣泛接受的認同。



第二章 1962 年北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1962 年爆發的北葉門內戰為長期以來葉門內部改革勢力醞釀已久的結果，而內戰的爆發也形成了共和政府與保皇派之間的對抗。其各自含有泛阿拉伯社會主義和保守王權的認同。同時，北葉門的內戰也吸引了埃及和沙烏地的介入，其各自支持共和政府與王室。然而這兩國在區域間也各自以泛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在進行角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1962 年的北葉門內戰同時存在著外部與內部的角力，這兩個層次的角力也進一步的形塑了這場內戰的發展。同時，這樣的角力也沿著某種認同的分歧在進行，並進一步影響各方行為者的認知，並界定其自身的利益。因此，本章在此將討論這場北葉門內戰發生的經過，同時以認同和內外的安全困境的角度，探討這場衝突中的內外動力如何相互影響，進而形塑衝突的發展。透過本章的探討，最終可以看到這場葉門內戰中存在著內外的認同安全困境，葉門內部泛阿拉伯與共和政體認同和伊斯蘭與王權認同競逐的結果，吸引了外部行為者埃及與沙烏地的介入，而後在外部行為者的影響下，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能力受到外部行為者的限制，一直到 1967 年外部行為者退出後，葉門內部才能形塑自身統一的認同。

第一節 北葉門內戰之發展

北葉門內戰的發展可以溯源至 1950 年代，當時北葉門境內的經濟狀況惡化，而王室政權在當時就有推行改革但未能成功。此外，泛阿拉伯主義也在此時流傳至葉門境內，與改革派勢力結合。而在前述王室所推行的改革失敗下，反對王室並建立共和的聲音就逐漸增長。

因此到了 1962 年時，當時的北葉門什葉王國就爆發了軍官革命，王室遭到軍官發動政變，國王向北逃竄，北葉門建立了共和政府。然而，遭推翻的國王其勢力並未遭到完全的剷除，國王逃至沙烏地境內，並重新號召保皇勢力進行反抗，抵抗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因此原本的政變演變成內戰衝突的局面，一方面是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另一面則是由保皇派，雙方的衝突幾乎持續了整個 1960 年代，同時也回應了區域間的大國關係 (Orkaby, 2017)。

而在內戰爆發之後，雙方的對峙形成僵局，內部行為者為突破僵局向外尋求支持，於是有了大國介入的契機。在共和政府這一方，主要是由當時的 Nasser (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 所領導的埃及支持，而保皇派這一方則是由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兩國的介入各有其動機，對埃及而言，葉門內戰是其在當時外交上一連串挫敗的一個破口，重回其泛阿拉伯主義思潮領導地位。而對沙烏地而言，埃及勢力在葉門支持著反王權的共和政府，是一大安全隱憂，特別是埃及和沙烏地在區域間已存在著角力，在冷戰的影響下彼此挾持不同的意識形態進行對抗 (Hinnebusch, 2014)。於是在區域間大國的支持下，北葉門內戰雙方的衝突陷入僵局，儘管有數次的談和行動，但終究未能創造穩定的局面。這一直到 1967 年六日戰爭後，在埃及於以阿戰爭失敗下才有創造新契機的可能。內戰雙方於是才進行新的談判，雙方同意妥協組成新的政治安排，並繼續維持北葉門的共和政權 (Orkaby, 20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這場北葉門的內戰中呈現著兩個層次上的動力。首先是葉門內部，主要是由共和政府和舊王室政權對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進行競逐。另外在外部的層次上，則有著沙烏地和埃及在區域間角力的影響，沙烏地將葉門的議題視為對其王室政權安全的挑戰，埃及則將葉門視為其提高自身在區域間的

影響力契機，而這股影響力為其所領導的泛阿拉伯主義思潮，其中強調的反帝國和共和思想也進一步挑戰了沙烏地的王室政權。

然而，若是我們單純地將這場內戰視為埃及和沙烏地的代理人戰爭，其有可能會忽略了葉門內部自身形塑這場內戰的動力。因為儘管雙方受到大國的支持，但其衝突的爆發本身是來自地方層次的因素，諸如部族的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經濟制度上對改革的呼籲等等(Day, 2012)，而代理人本身也有自身的考量，其利益並不一定會和沙烏地與埃及一致，因此有必要同時從外部與內部的動力進行檢視，探討這兩個層次上的動力如何相互作用，才能更完全的了解這場衝突的全貌。同時，有鑒於這場衝突中出現了明顯的認同分歧，因此本文也從認同的角度著手，去分析這兩個層次上的角力。儘管認同的歧異並非完全是這場衝突的主要起因，但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外部或內部層次上的角力，皆沿著一股認同分界線劃分衝突雙方的陣營，形成一種保守勢力和泛阿拉伯主義的對抗，在外部和內部的層次上形成了一種「認同上的安全困境」，彼此相互角力。

第二節 葉門內戰中的認同:背景與來源

而當我們欲從認同的角度探討，則必須先從葉門內部和區域間(外部)的認同形成背景進行討論。在認識過此時期葉門內外部的認同形成背景後，本章將進一步討論這些認同如何形成認同上內外部的安全困境，並討其所形塑的內外互動關係。

首先是革命後成立的共和政府的部分。在 1962 年 9 月 26 號，原本由 Hamid al-Din 家族統治的北葉門什葉伊瑪目王朝，遭到來自 Sallal (Abdulah al-Sallal)將軍所發起的軍事政變推翻，成立葉門阿拉伯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 YAR)

(Orkaby, 2017)。而若仔細再進一步探討這股勢力的組成，可以發現其包含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組合，同時包括新舊世代的改革運動份子 (Stookey, 1978)。由上可知，我們已發現這場革命的勢力事實上是由許多不同的行為者組成，其認同其實相當的多元，其中包含了跨世代的改革份子、重要商人集團與軍官等等，然而將他們集中在一起的是針對舊有王權的不滿，並期望透過共和的建立，成立一個新的葉門。然而在革命後，其內部成員也出現分歧，例如 YAR 和 Shafi'i 商人集團的分裂，因為後者並不支持由納瑟主義所提倡的中央集權的大政府制度，拒絕高度的國家管制，以保護其自身的經濟利益 (Stookey, 1978)。因此，儘管 YAR 高舉改革與社會主義大旗，但這樣的意識形態並非為所有葉門內部甚至改革派所接受，這對於 YAR 日後要整合葉門社會帶來許多挑戰。

而國王在被推翻後往北逃，並和北部葉門高地的部落勢力結合，形成所謂的「保皇派」(Royalists)。而國王之所以有辦法形成這樣反制革命的勢力，主要仰賴傳統 Zaydi 什葉派部族勢力的支持。Zaydis 過去和王室之間保有相當深的聯繫，此外對於傳統部族而言，其更重視的是部族本身的自主性以及武器和金援等 (Dresch, 2005)，並反對 YAR 所提倡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 (Stookey, 1978)，擔心其會壓縮本身的政治空間。於是在反對共和主義勢力的前提下，形成對革命的反制勢力。然而，保皇派本身雖然存有分裂，國王仍具有傳統王權的正當性，並在國際上也代表了內戰中的保皇陣營 (Stookey, 1978)。我們也可以發現，保皇派陣營多和過去所謂傳統的價值有所聯繫，而其主要關鍵的支持者則是部族，這些部族在過去的王權制度下，則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者。而在革命發生後，YAR 所提倡的共和主義和中央集權制度也是挑戰了他們的既有利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部族反對 YAR 的建立，而這些勢力也是保皇派所仰賴的重要力量之一。

而在外部層次上，1962 年爆發的北葉門內戰期間，最明顯呈現出來的認同對抗莫過於埃及與沙烏地之間所形成的泛阿拉伯主義與泛伊斯蘭陣營的對抗。無論是埃及大量投注軍事人力等資源支助 YAR 或是沙烏地對王室的支持，都可看出埃、沙兩國的積極介入參與，就介入的動機方面，埃及想要藉此提升在區域內的影響力，而沙烏地則是想要維護其政權與邊境穩定。而就認同的部分，埃及方面自 1952 年 Nasser 的軍官革命以來，及推崇所謂泛阿拉伯主義的思潮，而一直到 1956 年蘇伊士危機⁸後，埃及的 Nasser 總統在被視為成功對抗以色列的人物後成為泛阿拉伯主義的代表人物 (Hourani, 2010)。而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內涵包含了社會主義的色彩，同時追求阿拉伯民族的團結，並反對帝國主義以及向帝國主義靠攏的反動政權 (Stookey, 1978)，因此這也連帶的影響了沙烏地本身的政權正當性與安全，因其本身具有親西方的傾向，加上王室統治的色彩與泛阿拉伯主義衝突，被視為帝國主義的一部份。而在沙烏地方面，沙烏地的王室紹德家族在面對 1950 年代的泛阿拉伯主義崛起時，有試圖涵納這股勢力和思潮，同時內部也存有不同派系之爭，最後是以代表現代化改革派系的王儲 Faisal bin Abdulaziz al-Saud 勝出 (Abir, 1994)。而面對泛阿拉伯主義勢力的挑戰，除了上述提到的涵納動作外，沙烏地也進一步提出以伊斯蘭作為區域政治團結的方針，與阿拉伯主義分庭抗禮 (Hinnebusch, 2014)。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沙烏地與埃及分別代表了當時中東地區受冷戰影響下，主要兩個互相角力的陣營。其各自代表了兩種不一樣的認同，在埃及方面是所謂泛阿拉伯主義陣營，其代表了社會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強調阿拉伯的民族認同。而另一方則是沙烏地和約旦等王權國家，其並不完全排除泛阿拉伯主義的勢力，但也試圖從伊斯蘭的角度去建構區域團結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在中東地區這種疆界與認同界線不同的情況下，雙方試圖用跨國界的認同（阿拉伯民

⁸ 蘇伊士危機被中東地區的普遍認為是埃及的勝利，並被認為是泛阿拉伯主義的模式的成功，使 Nasser 成為泛阿拉伯主義指標性的領導人物(Hourani, 2010)。

族或伊斯蘭)，去建立自己對外團結的論述，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埃及和沙烏地境內皆有這兩種認同的存在，因此會形成競爭關係，除了擔憂另一方藉此認同去威脅另一方統治的正當性和穩定性，也在外交場域上形成角力的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場北葉門的內戰中，同時具有著內部與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在內部層次上，我們可以看到共和政府所採用的社會主義改革色彩，並同時結合了對舊有政治菁英不滿的勢力。另一方面，保皇陣營除代表了舊有政治菁英，並受傳統部族的大力支持。因此雙方也形成一種傳統舊勢力和社會主義改革之間的分歧，並在角力的過程中不斷強化這樣的身分。而在外部層次上，則是埃及與沙烏地的對抗，其也形成了泛阿拉伯陣營和泛伊斯蘭陣營的角力。然而儘管泛阿拉伯和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潮分別帶有社會主義和傳統保守的色彩，但其和北葉門內部的認同仍有不同。葉門內部的認同角力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無論是共和政府這方或保皇派，其皆有地方各自的認同色彩，例如部族的認同即是一個重要因素，其以親緣認同為主，並與國家認同競逐。但儘管如此，葉門內部的衝突仍舊牽動了埃及和沙烏地的介入，於是我們可見到內外部動力呈現了互相回應和影響的關係。這種內外部動力互相影響的過程，將是本章後續討論的重點，而以下將從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開始討論。

第三節 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改革派與王室

1962 年葉門內戰中，內部認同安全困境之形成，其首先要從革命運動的形成開始探討，並檢視針對這場革命，保皇派又採取哪些行動做反制，最後再討論內戰中，葉門內部的傳統部族又扮演了怎樣的角力，部族的認同將對內部安全困境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 1950 年代，泛阿拉伯主義也傳至了葉門境內，這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在面對英國的殖民下，反帝國主義的埃及會是潛在的盟友，然而在另一方面，埃及泛阿拉伯主義所帶有的改革色彩，對遵循傳統王權的葉門王室來說，卻也是潛在的威脅，雖然當時葉門部分的改革份子支持王儲的。而在 1955 年時，葉門曾發生軍官政變，但後來由當時的王儲幫助下平定。而在 1956 年時，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連成一線，同意一致對抗英國在區域內的控制（當時的埃及盡可能的對英國施壓，沙烏地則是和英國針對部分地方的控制權有衝突，而葉門則是想要控制當時英國控制的南部區域）（Dresch, 2005）。

另外在 1958 年時，埃及和敘利亞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時，葉門也欲積極加入，共同對抗英國（Dresch, 2005）。1956 年左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埃及和葉門是相對合作的關係。當時的埃及相當支持王儲，其和埃及的 Nasser 總統有相當密切的互動，甚至有資料指出其當時一度有可能推翻其父的政權。（Orkaby, 2017）。

葉門在 1950 年代時曾歷經過一些現代化改革，其包括經濟制度上的開放，並期望藉此解決葉門面臨的經濟問題，但葉門仍舊保持了傳統的王權政治體系，政治制度方面依舊遵循舊的傳統。經濟狀況方面，依舊是持續的依靠外援，但政治體制的無效率使這些外援大打折扣。而當時雖然不同教派間會有零星的爭端，但並不明顯，也不影響葉門的統一性，此外相較 1940 年代，整體社會更加世俗化（Dresch, 2005）。然而經濟發展的遲緩導致了不滿的聲浪，這樣的聲音剛好又遇到了泛阿拉伯主義的聲勢擴張，民眾開始對當權者有所不滿。除了反抗英國的「帝國主義」勢力外，也反對王室政權的「反動勢力」。而政府方面在發展政策和治理上的失敗，累積對外債務，使情況更是雪上加霜（Dresch, 2005）。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出現許多反對王權，要求進行現代化改革的份子，他們大多為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其中有許多為當時葉門在與埃及交好時，送往埃及訓練培養的軍官。這群知識分子之中，有部分認為僅有透過共和政府的建立，才能建立現代化的葉門，而由這些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團體，也相當受到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影響（Orkaby, 2017）。另一方面，Shafi'i 派系部族過去長期以來和支持王室的 Zaydi 什葉派部族關係緊張，過去王室就以行政區的劃分來將 Shafi'i 的資源分給 Zaydi（Day, 2012）。因此 Shafi'i 主張平等的社會地位、貿易自由以及資本的安全為主張，要求改革（Stookey, 1978）。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成了 1962 年的革命動能的產生，而其中對於共和政府的追求，也威脅了過去傳統王權統治的正當性。

然而在 1962 年 9 月的革命後，推翻王室而新上任的 YAR(Yemen Arab Republic)政府，卻也遭遇了整合的挑戰。首先最大的挑戰來自於過去傳統部族，特別是北部高地的部族。部族在葉門內部其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是葉門內部甚至是許多阿拉伯社會中，擁有長久歷史的社會結構。由於過往社會生活型態的關係，其依賴部族來組織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個人若是與部族脫離，將會陷入生活的困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部族具有很強的集體性，而這樣的集體性也使得其在組織動員上具有相當的能力和速度（Swagman, 1988）。也因為這樣的特性，部族在葉門當代政治運動中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政治運動的發展若是能爭取到不同部族的支持，便可以動員廣大的人力和資源。另外，部族也相當具有自主權，較少受到中央權威的束縛，在地方上保有相當高的自主性（Day, 2012）。

而在認同層面上，部族強調的是親緣的認同（Swagman, 1988），並以榮譽作為道德準則，也因此其和現代民族國所強調建立族群認同有所衝突，在部族強力的親緣認同下，國家要將其整合進單一的國族認同時會遭遇這種對部族認同的競

爭。就他們而言，更重要的是部族的自主性以及資源是否有受到保障，此外北部高地的 Zaydi 部族過去更是與王室有密切的關係 (Stookey, 1978)。由此可以看出葉門這些傳統部族本身的認同更是以自身的部族認同為主，對於泛阿拉伯的意識形態追求，並無太大的動機，葉門北部高地的部族長期以來即在中央權力掌控的範圍之外，相對於共和政府的建立，這些部族對於如何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更加有興趣，而 YAR 所強調的中央集權式的共和政府則和此目的背道而馳。同時這些部族在價值認同上偏向保守，並在過去就已和王權建立了連結，因此較不受泛阿拉伯主義或社會主義認同所吸引 (Stookey, 1978)。

而 YAR 所面對的另外的挑戰則是其無法促成葉門內部不同派系的對話 (Stookey, 1978)，其曾想透過社會主義的思潮作為整合工具，不斷地強調泛阿拉伯主義和納瑟主義的意識形態，想藉此建立某種認同來整合葉門內部不同的派系和團體，卻也未能成功消弭部同派系間的分歧。在這樣的情形下，也構成了 al-Badr(王儲)後來能夠進行反制的基礎。其中，Zaydi 部族過去即和王室有相當深的歷史淵源，其中王室為什葉派的王權國家，由 Zaydis 的伊瑪目為國王，同時 Zaydis 的部族也在內戰中提供了許多的人力資源，是支持 al-Badr 的重要勢力 (Stookey, 1978)。而主要支持 YAR 的埃及軍隊，由於不善長在山地作戰的緣故，因此在往北進展的過程中，遭遇了這些部族勢力的頑強抵抗，形成僵局的局面 (Orkaby, 20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北葉門 1962 年內戰中所形成的內部安全困境，其實是經過長時間的互動過程形成，同時部族的社會結構也影響了這樣安全困境的形成。早在 1950 年代時，北葉門內部已經存在著對改革的呼籲聲音。同時，泛阿拉伯主義的思潮也進入了葉門內部，葉門本身在認同上與所謂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維持了一種巧妙的平衡關係。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興起一方面帶來了合作的機

會來抵抗英國的殖民勢力，在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因為其所激起的改革運動，為王室統治的正當性帶來威脅。這樣的威脅體現在後來要求改革的聲浪中，最後也導致了革命的發生。於是改革的呼籲逐漸醞釀成革命的勢力，並受社會主義之影響，最終發動革命建立共和政府。而保皇派面對共和政府的建立採取抵抗的策略，在傳統部族的支持下保護本身既有的利益，因為 YAR 所具有的社會主義色彩與中央集權的主張，為葉門北部高地的傳統部族帶來憂慮，成為王室反制的基礎，雙方於是在這樣的互動下，形成了一種保守勢力和泛阿拉伯主義競爭的安全困境。但除了本身具有的意識形態(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王權)所提供的認同，葉門的部族社會結構也形成強力的認同來源。也因此部族的認同會和上述的認同競爭，甚至強過意識形態本身，因此雙方陣營都必須去爭取部族的支持，再藉由這些部族認同所帶來的號召力進行政治動員，最後，在認同的內部安全困境的層次上，這也使得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競爭出現了一些調整，一方面是所謂傳統派和泛阿拉伯社會主義的競爭，但另一方面卻又得平衡所謂國家和部族之間的競合，形成一種相互拉扯的關係，也使得王室和 YAR 兩方必須去爭取並整合部族的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部族過去在傳統上和王室有較深的歷史淵源，加上共和政府所強調的中央集權主義與部族本身的利益產生衝突，王室一方是顯得較為有利的。部族的認同也形成了葉門內部安全困境的另一種維度，與意識形態一起形塑內部的安全困境之形成。

至此，已經可以看到此次北葉門內戰中，內部層次所具有的認同競逐，在彼此相互排擠的情況下，形成了互斥的認同。然而在外層層次上，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的角力也衝擊了葉門內戰的發展。沙埃兩國間的認同競逐最後也會衝擊上述北葉門內部的認同角力。因此，區域層次的認同安全困境(由沙國與埃及領導)，和葉門內部的認同安全困境彼此間存在一種回應的關係，並影響了外部行為者的介入，最終也形塑了內戰的發展結果。

第四節 外部的安全困境：泛阿拉伯與伊斯蘭

同上所述，北葉門內部在 1960 年代前後逐漸形成由部族和意識形態以及國家政體認同所建構的認同安全困境。而在內戰爆發後，這樣內部的角力也驅使了沙烏地和埃及兩個區域內國家的介入。而埃及與沙烏地之所以介入北葉門內戰，也和兩者之間的角力相關。進一步來說，沙烏地與埃及由於意識形態上及政體認同上的差異，逐漸在中東地區形成相互角力的安全困境，而在這樣的影響下，也提供了埃及和沙烏地介入葉門的動力。而在沙烏地與埃及的介入後，也對葉門本身的認同安全困境產生影響，特別是在埃及的影響上，再一次的形塑葉門內部的認同與角力。

在 1962 年葉門內戰爆發時，當時在中東地區主要有兩方勢力或陣營在進行角力。首先是以埃及和敘利亞等國為首的泛阿拉伯主義陣營，其受蘇聯支持，主張阿拉伯民族的團結，採行社會主義路線。另一方面，則是以沙烏地和約旦等王權國家為主的陣營，主要是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並在價值認同上偏向保守光譜，較強調伊斯蘭路線(Hinnebusch, 2014)。而就在葉門內戰爆發前夕，在泛阿拉伯主義陣營內部即有不小的分裂。埃及、敘利亞以及伊拉克就泛阿拉伯主義的路線有所分歧，尤其在所謂建立共同的阿拉伯國家上，對於主導權的競爭上導致了分裂(Hinnebusch, 2014)。這也導致了 UAR 的解體⁹。

在上述的情況下，以泛阿拉伯主義領導自居的埃及總統 Nasser，在外交環境上面對了不小的壓力，急需拉抬自身的威望。因此，他視葉門內戰為關鍵的機會，

⁹ United Arab Republic，中文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該國為 1958 年在泛阿拉伯主義高峰下由埃及和敘利亞短暫結合組成的國家，其後由埃及與敘利亞之間的歧異，該國於 1961 年宣布解體(Rogan, 2010)。

並評估若是能協助葉門的共和政府穩固政權，即可讓自身的威望有顯著抬升，重奪外交話語權(Wenner, 1967)。而在埃及內部方面，其早在革命發生前就有相當程度的支持葉門的異議份子，如其接收海外逃亡的葉門反對派至開羅進行發聲。葉門的 FYM(Free Yemni Movement)運動也相對受到 Nasser 的支持(Wenner, 1967)。另一方面，沙烏地政府面對來自泛阿拉伯主義陣營的挑戰時，一開始是採取涵納的態度(Abir, 1994)，然而在 1956 年蘇伊士危機後，泛阿拉伯主義聲勢大漲，沙烏地變得更加警戒泛阿拉伯主義陣營的勢力，因其可能會影響對國內的控制以及區域的權力平衡(Hinnebusch, 2014)。另外，沙烏地也支持埃及內部受 Nasser 壓迫的穆斯林兄弟會，兩國的關係也在 1958 年後因一起暗殺計畫的曝光而惡化(al-Rasheed,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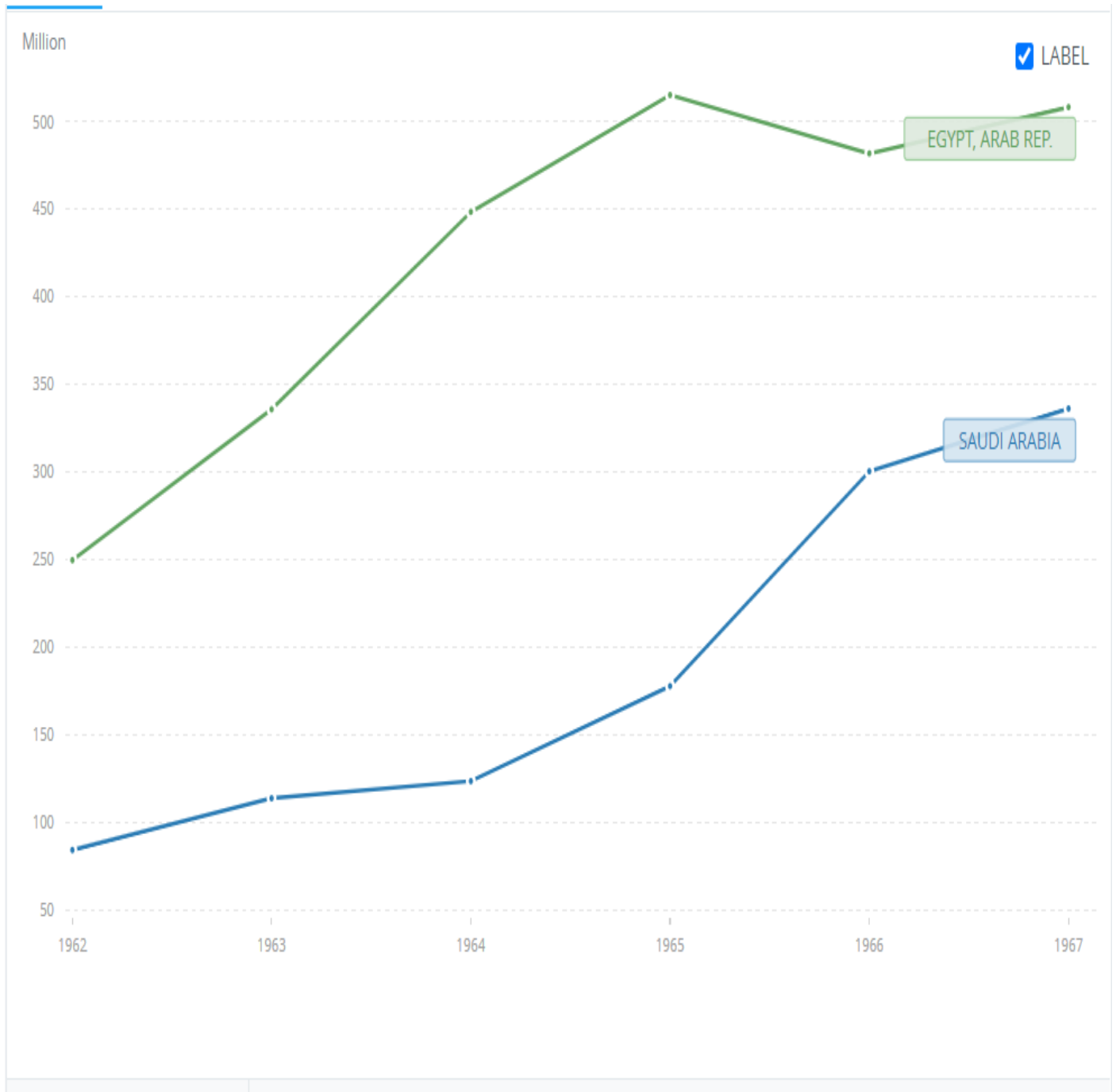
而沙烏地政府在葉門革命發生之初相對採取觀望保守的態度，推估原因在於過去剛被推翻的國王和 Nasser 之間過從甚密，對其有所懷疑。然而葉門王室的接觸和說服下，加上埃及大動作的介入，引發對於邊境安全的顧慮，沙烏地於是開始援助葉門王室 (Stookey, 1978)。雙方在葉門問題上衝突加劇，YAR 和埃及方面更是揚言要將革命輸出，例如 YAR 曾經宣稱要讓其軍隊進入沙烏地，並奪回葉門「被奪走的」領土。這讓沙烏地更認為埃及在葉門的介入是為了在阿拉伯半島培養親埃的勢力，並推翻沙烏的王室政權，奪取石油資源，但這並不代表埃及有推翻沙烏地王權的意圖，而是沙烏地本身在上述 YAR 的宣言中所產生的一種認知，於是在政權的安全性受到威脅下，沙烏地也加強支援的力道。而埃及方面的回應則是認為沙烏地才是侵略的外國勢力，埃及的軍隊是為了保護革命的成果才介入的(Wenner, 1967)。

同時在葉門內部，共和政府在遭遇王室於葉門北部高地的頑強抵抗下，必須考量尋找外部勢力的支持，於是向埃及求援。另一方面，王室也說服了沙烏地對

其進行援助提供金援 (Stookey, 1978)。而在外國勢力(沙烏地和埃及)的介入下，葉門內戰的雙方卻也似乎失去相當的主導性。其中以 YAR 共和政府的陣營更為明顯。由於在 Nasser 的強力支持下，共和政府必須得建立一套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泛阿拉伯主義論述，一直到 1967 年埃及從葉門撤退前，可以看到 YAR 一直重複地強調泛阿拉伯主義、民族團結、反西方殖民、批評錫安主義和反動政府以及強調每個國家需經過解放才能達成團結的目標等等 (Stookey, 1978)。另一方面，沙烏地對於王室和其支持者的限制似乎未如埃及對 YAR 的限制那般明顯，此外相比埃及直接駐軍在葉門境內，沙烏地的支持多以金援為主(Wenner, 1967)，推估沙烏地對王室所形成的限制為如埃及明顯可能在介入程度的差異上。透過下圖我們可以看到在 1962 年左右，沙埃兩國在軍費支出的差異或許也顯示了兩的權力差距，間接影響了沙烏地與埃及在葉門的介入程度。

下頁圖為 1962 年至 1967 年間沙烏地與埃及的軍費支出(以當今的美元價值計算)。可以看到埃及在這段期間對於軍費的支出是遠大於沙烏地的，因此也可以大概看出兩者間的軍事力量差距，這或許也是沙烏地選擇以金援為主支持王室的原因。

圖 2-1 軍費支出(World Bank opendata)



然而上述這樣的認同建構卻是相當外來的，未能考量葉門內部的接受程度。這樣也使得葉門民間與社會對 YAR 政府產生不信任，例如 Shafi'i 商人就對於 Nasser 所提倡的國家管制有所顧慮，反對國家對經濟做過多的管制（Stookey,

1978)。甚至是軍方也對當時的領導人 Sallal 不信任(Wenner, 1967)。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葉門內部不同的團體對於這樣的論述有相當的程度的反感，並造成 YAR 的共和政府無法完全的收編整合不同的內部認同，也使得部分共和政府的溫和派產生分裂 (Stokey, 1978)，例如部分在共和政府內部的重要人士開始和王室接觸，而部分原本效忠共和政府的部族也叛變至王室陣營或是和其接觸 (Wenner, 1967)。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共和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人想要推動從葉門自身利益出發的目標，這樣的一個目標也為日後和王室產生和解提供了主要的論述框架 (Stokey, 1978)。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外部行為者的強力介入下，葉門本身內部的行為者由於在物質資源層面相當的仰賴這些外部行為者，也因此造成了他們相對地失去自主性。這樣的情況也影響了這些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我們可以看到在 YAR 方面尤其明顯，其在埃及大力支持下成為 Nasser 的泛阿拉伯主義宣傳者，然而這樣的認同建構並非完全由葉門內部自我建立而成，而是相當大的程度受到外部行為者的影響，這也造成 YAR 並無法取得葉門內部群體的共識和接受，並被視為相當「外來的」(Stokey, 1978)。

儘管沙烏地和埃及都視這場內戰對於革命的意識形態像阿拉伯半島的輸出至關重要，但在內戰形成僵局的情況下雙方都各有因素來促成和解。在埃及方面，經濟上資源和人力的投注已是顯著的負擔 (Orkaby, 2017)。在政治上，至 1962 年底時，國內已有反對葉門內戰的聲量(Wenner, 1967)。對沙烏地而言，在經濟上雖然未造成重大的負擔，但其內部此時也在推行改革，沙烏地擔心內戰若耗時過久，會成為其內部反對勢力的焦點，同時沙烏地也相信若是埃及撤退，共和政府在失去支持的情況下會敗退。到了 1965 年，沙烏地和埃及雙方也展開過數次的談判協商撤軍，然而雙方在互信基礎不足，且未能徹底實行協議內容的情況下，

這些暫時性的停火未能達成任何長遠的目標 (Orkaby, 2017)。另外，美蘇兩大強權也期望這場戰爭能使埃及 Nasser 總統被困在葉門，降低其和以色列發生劇烈衝突的可能性 (Orkaby, 2017)。另一方面，埃及的 Nasser 總統也想離開葉門，因為其分散了埃及許多的軍事資源，這對於和以色列日益加深的衝突並非有利的情況。

在 1967 年，六日戰爭的爆發終究還是重創了埃及，無論是在軍事或是外交層面上，Nasser 面臨了大敗，在這樣的態勢也使得埃及離開葉門成為可能。另一方面，葉門內部在不滿外來者干預的情況下，本身也出現了統一的声音，葉門本身的國族認同逐漸加強，對於未來共和政府和保皇份子間的協商和談判提供了論述框架 (Stokey, 1978)。在 1967 年的阿拉伯峰會中，葉門與埃及在葉門問題上達成協議。埃及開始從葉門撤軍。而在失去埃及政府的支持下，YAR 轉向蘇聯求助。然而，就在此時位於南方的南葉門共和國成立，由於其較符合蘇聯本身利益考量的緣故，蘇聯決定將其在南阿拉伯半島的支持重心放在南葉門上。在這樣的情況下 YAR 方面失去支持，迫使雙方最後達成和解。和解後的北葉門政府在意識形態為內戰時雙方的一種融合。在政體的認同上仍保持共和政體，然而其更偏向保守主義，而先前的保皇派也維持了一定的勢力。因此其在政治光譜上更偏向右派，這也反映在它和西方陣營與沙烏地的關係上，使其獲得改善 (Orkaby, 20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沙烏地與埃及在當時的中東地區逐漸形成一種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保守王權的認同對抗。而雙方在互動過程中，也不斷激化和強化這樣的角色與認同並進一步形成認同的安全困境。我們可以發現泛阿拉伯主義的崛起造成了傳統王權國家如沙烏地的不安，因其對內可能會影響王室統治的正當性，對外可能也會造成權力平衡上的隱憂。而因阿拉伯的民族認同是跨國界的，

沙烏地自然也會面對泛阿拉伯主義對其國家認同所產生的挑戰，在這方面沙烏地先是試圖涵納所謂區域團結的概念，一方面也藉由伊斯蘭提出新的論述，強調以伊斯蘭做為區域團結的軸心(Ahmad and al-Surahrn, 2008)。而對埃及而言，當時其內部也有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競爭，對外方面在經歷 UAR 的解體後，以及和敘利亞伊拉克的分歧再再的凸顯對於聲勢拉抬的需要，此時葉門即呈現了一個破口和機會，藉由對葉門革命的支持，它能夠重新拓展其在泛阿拉伯主義的話語權，強化對該認同的建構能力。

這樣的舉動也進一步刺激了沙烏地，在考量其邊境安全甚至是統治的穩定性之下，沙烏地也做出了回應，選擇支持王室。對沙烏地而言，如何維持王室統治的正當性在此事相當重要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對於葉門革命的合法性產生質疑，而埃及在葉門的介入也代表了泛阿拉伯主義的勢力延伸至阿拉伯半島南部。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外部安全困境與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產生了互相回應的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基於沙烏地和埃及的角力與認同下，葉門內部產生的動盪與分歧對埃及與沙烏地而言產生了不一樣的意義與利益。對埃及而言，北葉門內戰提供了其再次提升和恢復泛阿拉伯主義外交影響力的契機。而對沙烏地而言，埃及進入葉門顯現的是其泛阿拉伯主義思潮對沙烏地王權的挑戰，因此在邊境甚至是政體的安全受威脅下，也介入葉門進行回應。然而在外部勢力的介入下，也對北葉門內部的認同角力產生影響。

首先是在物質層面上，沙埃兩國的介入使得內戰雙方產生了新的均勢與平衡，雙方的勢力進展在你來我往間形成停滯狀態。其次是在認同層面上，外來勢力的介入對北葉門內部的行為者認同建構上產生了影響。其中，埃及對共和政府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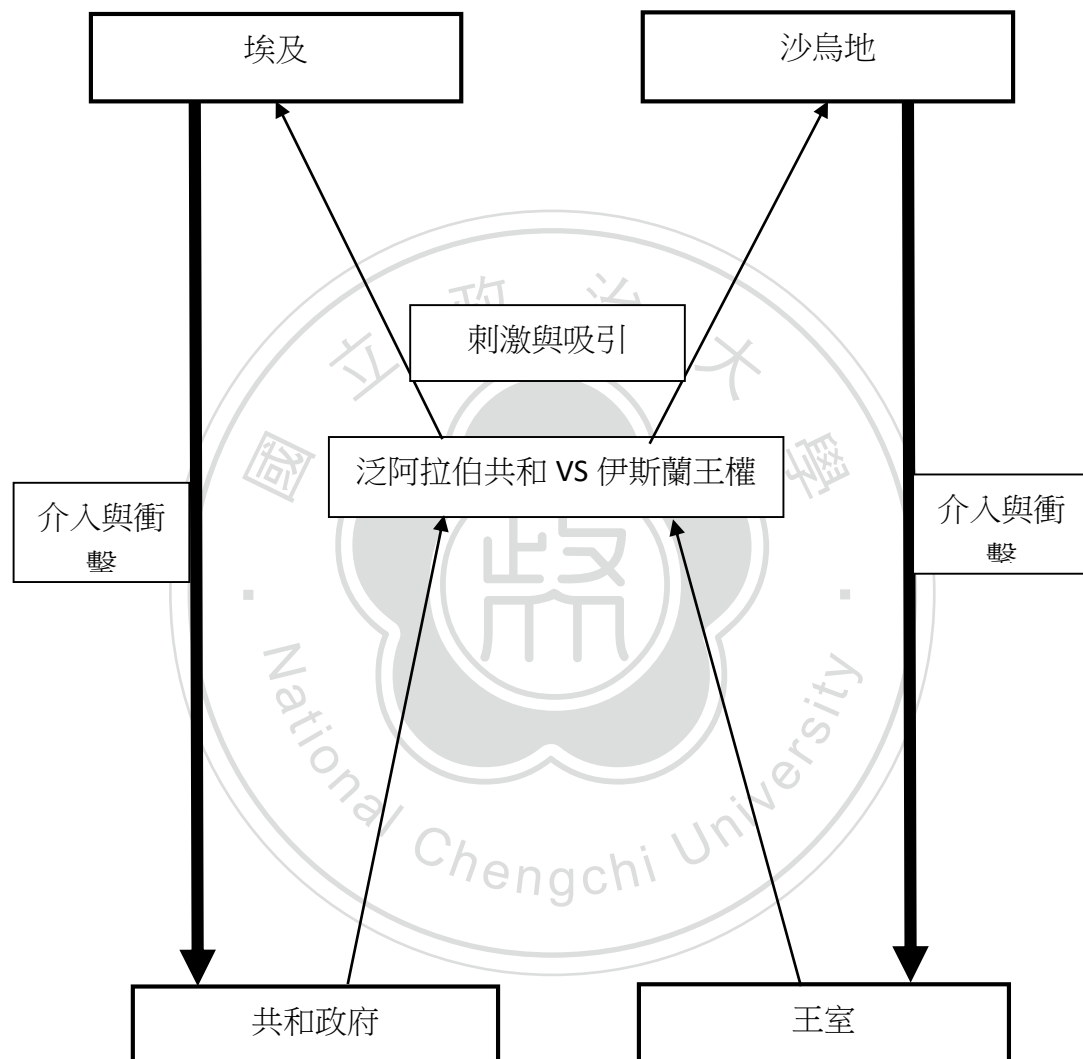
響又比沙烏地對保皇派的影響更加強烈。由於埃及的大力支持，共和政府在認同上更向 Nasser 版本的泛阿拉伯主義靠攏，反而使得其和北葉門本土當地的認同產生離異，這樣的離異也使得共和政府被視為外來政權的傀儡，反而更加不利共和政府整合其內部的不同認同，也促使不同意共和政府者進一步發展日後雙方和解的認同。更進一步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外來勢力存在於葉門內部也招致了當地的反感，反而更促進了葉門自身本土認同的建立，這樣的本土認同的訴求也形成了後來部分共和政府溫和派和保皇派能達成協商論述框架，主張葉門的一統和建立。

然而儘管內部存在這樣的認同驅動力，在埃及與沙烏地的對抗和角力下，葉門自身內部的團體和勢力難有發揮的空間，這樣的情況也可視為在物質方面的權力結構下，對這些認同團體在建立認同上的某種限制，因為內戰雙方，特別是 YAR 皆都需要來自沙烏地和埃及在物質層面的援助，因此回到上述所提到的，葉門內戰的雙方儘管有自身認同上和利益上與沙烏地和埃及的不同調，但因在層物質層面上皆須仰賴這兩國的軍事或經濟支持，主導權仍舊掌握在這兩個國家手上。而一直要到 1967 年的六日戰爭後，埃及與沙烏地願意達成和解退出，葉門內部雙方才有空間建立新的認同，重新拿回主導權。而在整合雙方的認同下，北葉門的共和政府在戰後也形成有別於戰前的認同，其在認同的光譜上呈現向右和保守靠攏。

最後，本節所敘述的這種內外層的認同安全困境可以整理如下頁圖：在圖中可以看到共和政府 YAR 和王室的競爭透過泛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這兩種認同吸引了外部行為者埃及和沙烏地的介入，因為後兩者在外部的層次上也有這種認同的競爭。而在區域行為者介入後，可以看到他們對內部行為者的衝擊。而由於外

部行為者所具有的認同建構能力更強，圖中便已較粗的實線顯示，以凸顯他們限縮內部行為者認同建構的能力。

圖 2-2 認同內外安全困境相互回應之結構



第五節 認同的內外互動：動機與衝擊

我們可以看到，1962 年的葉門內戰反映出了一種內外部的認同互動關係。首先，各方行為者的認同形成有其背景，YAR 方面的認同形成受到當時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影響。主要的革命領導人物中有不少是有和埃及的泛阿拉伯主義思潮有連結，如曾赴埃及或外國接受軍事訓練並接觸改革思想。而在共和主義者內部卻也存在不同分歧，其組成也含納各方勢力，然而連結這些不同行為者的主要認同在於追求一個改革現代的葉門，並認為只有透過共和的建立才能達成這樣的目標。而在王室和保皇派這一方，則可以看到其代表了過去的守舊勢力，儘管內部也有不同陣營的分裂，但整體仍是採取較偏向傳統的認同，並較強調伊斯蘭的論述和話語，而即使是內部的改革派，也反對建立共和政府，強調在君主制的存續下進行溫和的改革。而另一方面則是葉門北部高地的部族，其在內戰期間多是支持王室的，這除了其傳統上與王室的淵源較深之外，目的也是為了保存其完整的自主性。

針對部族的認同討論中，筆者發現葉門部族內部的認同其實存在獨特性，相較於所謂現代國家的國族認同，或是中東地區內的跨國界認同（如泛阿拉伯主義），部族的認同歷史其實相對長久，並以所謂親緣關係作為主體認同，並具有很強的集體性和動員能力。因此，與其說北部高地的部族被納入所謂傳統伊斯蘭的認同下，更不如說保皇陣營的認同相比 YAR 的泛阿拉伯主義認同和這些部族的認同契合性更高，因為這些部族對於 YAR 的中央集權色彩有所遲疑。

而就內部認同的安全困境部分，1962 年 YAR 的建立其實反映了是長久以來葉門內部針對過去政權的不滿，以及王室政權對於改革上的失敗。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份子唯有認為建立共和政府才能徹底改革葉門建立現代國家。因此在

這樣的情況下，王室的統治正當性受到質疑，因此也可以看到其更加強調葉門過去的傳統伊斯蘭認同，並試圖與所謂社會主義和革命思想保持距離。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葉門內部形成一種傳統和現代對抗的分歧，其中保皇派強調的是過去的傳統價值和伊斯蘭，而改革者則強調泛阿拉伯主義和社會主義認同，以此建立現代的葉門政府。而在這兩方陣營僵持之下，雙方各自也引入了外部的行為者勢力，將這場內戰拉抬自區域層次的衝突。

在外部行為者方面，1962 年葉門內戰的主要參與者為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這兩者在當時區域內也分別代表了兩種不一樣的認同分歧陣營。在埃及方面，其所代表的是泛阿拉伯主義的勢力，強調阿拉伯民族的團結，並奉行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並抨擊部分親美的保守王權勢力，稱其為守舊反動勢力。而在沙烏地方面，由於當時區域內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甚為流行，其曾試圖將泛阿拉伯主義思潮涵納進其自身的認同建構中，以回應國內對改革的需求。而其後在面對埃及對其的批評，沙烏地採取伊斯蘭作為論述手段，試圖將中東地區的團結符號從阿拉伯民族改為伊斯蘭認同，甚至成立伊斯蘭聯盟進行制衡。

至於葉門內戰如何從內部安全困境進而牽連到外部層次並將沙烏地和埃及牽扯進來主要有以下因素。首先對埃及而言，儘管其在 1956 年蘇伊士危機後成為泛阿拉伯主義的領頭羊，但 1962 年時，所謂泛阿拉伯主義陣營內部也出現分裂，在面對競爭的情況下，葉門成為 Nasser 再次穩固其威望的機會，並希望藉此重奪泛阿拉伯主義的話語權。因此筆者觀察到 Nasser 決定干預葉門的動機，在認同層次上是為了穩固其在泛阿拉伯主義認同上的形塑能力，以回應其領導聲望上的威脅，而這樣的威脅其實是來自於更加以國家而非阿拉伯民族為中心的國族主義，並希望藉葉門的機會來穩固受到挑戰的泛阿拉伯主義認同。而對沙烏地而言，一個透過革命推翻王室而建立的政權本身即是可能對其政權成為威脅的來

源，另外在埃及大肆地介入之下，葉門更直接成為其邊境的安全威脅來源。在認同的層次上，葉門 YAR 政府多次宣稱要將革命推展至沙烏地更是直接挑戰沙烏地王室的底線，及王室統治的正當性。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沙烏地在認同層次上試圖建構以伊斯蘭為主的認同來挑戰所泛阿拉伯社會主義，並選擇援助葉門的王室來抵抗共和政府。

而在沙烏地和埃及的介入後，葉門內戰無論是在物質層面或是意識形態上皆陷入了僵局的情勢。在物質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雙方並無能力取得絕對性的勝利，而幾次的協商撤軍也都因缺乏互信而破局，一直要到 1967 年的以阿戰爭後，埃及在元氣大傷的情況下才終於達成撤軍。而在認同的層面上，本篇研究也發現在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下，葉門內戰雙方皆在認同的建構上失去很大的自主權。在 YAR 方面，其大肆地鼓吹 Nasser 版本的泛阿拉伯主義和社會主義造成了其和葉門內部社會情況的脫節，也無法整合葉門社會的各方勢力，甚至被視為埃及的傀儡和傳聲筒，加強了 YAR 政府「外來感」的形象。而在保皇派方面，推估由於是沙烏地的支持較為間接，其相對較不具有所為代理者的外來形象。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必須保有特定的傳統價值的形象，若是背離這樣的傳統價值，也會使得當地部族在害怕失去其傳統自主性的情況下，對於支援王室產生質疑，而部族的動員更是王室主要的人力來源。最後，在埃及與沙烏地達成和解退出後，雙方才有辦法建構一個更統一的認同，重掌對於葉門國族認同建構的能力。這也反映在和解後所建立的政府上，其維持了共和體制，卻在價值上向右傾斜，為一保守的共和整體，反映了相當程度的融合。

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如同前章所提到的，2014 年的葉門內戰也存在著內外部的動力互相回應，影響並形塑衝突的發展，同時這樣內外部動力的回應存在著認同的維度，沿著不同的認同分歧進行對抗。1962 年所發生的北葉門內戰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皆與中東地區內其他行為者的角力發生牽連的關係。然而不同於 1962 年以泛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王權的競爭，2014 年的認同角力隨後發展出教派衝突的色彩。在中東地區，當代教派的認同衝突可追溯至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的發展(Abdo, 2017)。因此透過對於認同的探討我們能更深入地去發現各方行為者對於彼此的認知，以及這樣的認知如何去形塑他們彼此間的安全關係。所以，以下將針對 2014 後的葉門內戰做討論，探討區域間及葉門內部不同認同的形成背景，以及其如何形塑葉門內部不同行為者的競爭關係，並進一步影響外部區域間不同認同競爭的角力。以及最後這兩股動力如何互相回應，形塑衝突的局面，進一步了解認同在這場葉門內戰扮演的角色為何。而最終透過本章的討論可以看到，雖然傳統上教派認同並非葉門政治的主軸，然而在精英階層與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下，逐漸形成一種遜尼與什葉相互對抗的認同框架，而這樣認同建構若是在持續發展下去，則可能發生內化的情形。

第一節 葉門內戰爆發：阿拉伯之春之遺緒

在針對葉門內戰中認同與內外不同角力的進行討論前，有必要先針對此次葉門內戰的爆發做簡要的闡明，釐清事件發生的先後關係與脈絡，這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葉門內戰中認同與內外部行為者角力和內外部安全困境的形成。因此本節以下將先針對阿拉伯之春在葉門爆發以來的事件作爬梳，以便理解內戰的形成背景，並立下認同內外安全困境的討論基礎。

2010 年底，從突尼西亞開始的阿拉伯之春抗議浪潮也席捲了葉門。葉門由於長期的經濟惡化與政府貪腐的問題，使青年對於長久執政的政治菁英階層感到不滿，許多青年紛紛上街抗議，要求政府下台。而示威者就算在政府的強力鎮壓下，仍未退縮。而這批抗議的青年與改革團體則是包含了跨越教派與部族的各方勢力。因此在逐漸加溫的反政府抗議浪潮下，長期統治葉門的 Ali Abdullah Saleh(以下稱 Saleh)總統下台，並由原先的副總統 Abdrabbuh Mansur Hadi(以下稱 Hadi)擔任新的總統(Lynch, 2016)。此時，由 GCC(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出面主導的政治轉型計畫也開始針對葉門後續的政治安排做協商調整，舉行全國對話集結各方勢力進行討論，並統合葉門內部不同的地方勢力，進行新的政治談判以期能就後續葉門政府的形成達成共識。

然而，由 GCC 主導的政治轉型計畫卻有著根本上的缺陷。首先是在葉門內部長期的分裂下，各方勢力缺乏互信，進而導致了轉型計畫未能成功協調各方勢力，特別是來自北方的胡賽武裝勢力(以下稱 Houthi)與南方的分離運動(Stacey, 2017)¹⁰。其中北方的 Houthi 運動源自於 1990 年代的葉門，並曾和 Saleh 政府發生過多次的武裝衝突(Salmoni, 2010)，在此背景下，Houthi 與 Hadi 政府未能成功建立互信，難以達成協議，建立共存的政治秩序。再者，當時上街抗議青年的聲音也未被採納，對這群當時上街抗議的青年而言，轉型計畫只不過是將政治權力從一群舊菁英的手上轉至另一群的舊菁英，因此與當時訴求的全面政治改革不同，未能消散社會對政治菁英的不滿情緒，於是轉型計畫的成功機會渺茫(Carapico, 2013)。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 GCC 所主導的轉型計畫提出了國民對話簽訂協議，來自北方的 Houthi 卻也把握了仍舊沸騰的民怨，組織反政府的活動，並在 2014 年，把握對於補貼政策不滿所形成的民怨，圍攻首都沙那。Hadi 總統於是

¹⁰ 南方的分離運動勢力(The Southern Movement/ الحراك الجنوبي)為 2007 年以來訴求南方獨立的團體，目前的掌握範圍為葉門南部的省分為主 (السوفيت، 1990)。

撤出首都，雙方發展成內戰的衝突局面(Stacey, 2017)。

葉門境內的動盪也引起了區域國家間的關注，因此除了引領 GCC 進行政治轉型計畫外，在 2015 年，沙烏地阿拉伯在其邊境安全方面的考量下，也宣布了介入葉門的軍事行動，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援助葉門的政府軍一方¹¹。另一方面，作為叛軍的 Houthis 也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支持。然而與沙烏地直接出軍介入相比，伊朗的支持似乎較為間接，多為外交或政治上的支持，是否有實際上的軍事支持則較為不明確並缺乏足夠的證據顯示伊朗對 Houthis 有直接的支持 (Pardhan, 2017)。但可確定的是，葉門內戰的發展連帶的牽連了區域國家間的介入，並將葉門內戰的問題帶入了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角力之中。也因此葉門內戰的問題也被納入了所謂當前中東地區政治角力，尤其是繼 2003 年後開始興起所謂教派衝突中，沙烏地與伊朗兩者間利用教派認同與團體所進行的區域競爭 (Abdo, 2017)。

此外，之所以會有上述這樣的葉門與區域政治的連結，有一部份是因為作為叛軍的 Houthis 為葉門傳統的 Zaydi 什葉派，而沙烏地和伊朗則各自代表了中東地區的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認同，並將內戰的雙方視為各自的代理人。然而這樣的論述卻有其侷限，可能會忽略了葉門內部所具有的動力，並將這些內部動力視為單純的遜尼和什葉代理人，進而忽略這些所謂代理人和沙烏地與伊朗兩國間的分歧以及大國介入對葉門內部政治環境與自身認同建構能力所造成的衝擊。而在雙方經過長久的衝突後，至今仍未能達成全面的停戰協議，儘管來自聯合國等其他第三方的協調下，曾達成過短暫的停火協議(Hill, 2017)，然而在雙方互信基礎薄弱下，停火協議也被多次打破，雙方互相指稱對方不遵守協議，至今未能真正達

¹¹ 在後續南方運動與 Hadi 政府的衝突中，可看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主要支持的是南方運動的勢力，然本文主要探討的時間限定在 2018 年前，當時南方運動與 Hadi 政府多還是結合的狀態 (Younes, 2020)。

成全面永久性的和平。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 2010 年阿拉伯之春後葉門內部不同行為者的分裂所引起的衝突，其根源可以追溯至過去的歷史，特別是 Houthi 和中央政府間自 1990 年代以來的衝突，其中 Houthis 運動的訴求是提升 Zaydism 的政治文化權力。而 Houthi 所具有的什葉認同，更是將葉門內部問題帶入區域的層次，其是因為中東地區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衝突和分裂越朝向教派化的模式發展 (Abdo, 2017)，沙烏地和伊朗各自以宗教認同作為在區域進行權力角逐的工具，在這樣的背景下 2014 年發生的葉門內戰便有誘因吸引了沙烏地與伊朗進行介入，其中沙烏地更是直接派軍介入支持政府軍。

然而若只是將葉門的內戰問題放在代理人戰爭的框架下檢視，便會忽略葉門內部的行為者所具有的獨立性，以及區域間大國對其所造成的影響。Houthi 作為反政府的運動具有長遠的歷史，其甚至可以追溯自 1962 年遭推翻的什葉王權政府，再加上 Houthis 的什葉派分支為 Zaydis 與伊朗的什葉派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說葉門境內 Zaydi 什葉派與遜尼派在宗教實踐上更為接近，故 Houthi 本身的反抗運動是相當本土的 (Clausen, 2015)。也因此，有必要從葉門的內部和外部去檢視這些不同行為者的互動關係，才能完整描繪這場自 2014 年後的衝突全貌。此外，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認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別是教派認同的部分，因為儘管葉門的 Houthis 和伊朗的什葉派相比，更接近所謂的遜尼派 (Clausen, 2015)，但仍舊似乎被沙烏地視為伊朗的什葉勢力代理人，這顯現了區域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教派衝突思維或認知，再加上 Houthis 的運動訴求本身也帶有政治色彩，因此儘管葉門內部的衝突以及沙烏地和伊朗間的角力並非直接源自於教派本身的不同和對宗教的不同詮釋，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派的認同在其中扮演了形塑衝突的角色，並影響了雙方的論述框架，作為增進雙方影響力的工具之一。所以

也有必要去檢視這場衝突中，各方行為者教派認同強化的動力來源，以便更能釐清各方衝突的動力與關係。

第二節 認同的形成：背景與來源

若欲檢視認同在這場內戰所扮演的角色，便要先理解各方行為者認同的形成過程，以及在葉門內部及外部區域間存在怎樣的背景，使得內外部的行為者發展出不同的認同。因此，有鑑於教派認同在這場葉門內戰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本節首先會在區域層次上討論當代中東地區教派認同強化的背景，特別是伊斯蘭認同在中東地區的強化，一直到阿拉伯春後教派認同所扮演的重要性。此外，也會檢視葉門內部不同行為者間的認同形成之背景，並對不同行為者做初步的檢視，探究其本身的起源。最後，這些背景的出現為當代許多中東國家的認同來源，而認同的形成也對於許多中東國家如何界定自身利益和角色產生影響，進一步影響彼此的互動關係。上述這樣的由認同所帶來的互動關係也顯示在 2014 年葉門內戰中，葉門與沙烏地和伊朗的互動關係上。

教派認同在中東地區有久遠的歷史，而在伊斯蘭歷史的發展的軌跡上，教派之間關係也發生過數次緊張或和諧的階段。而目前當代中東地區所出現教派認同競爭的建構，可以追述至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自從海珊的政權被推翻後，中東地區在伊拉克方面留下了權力真空，給了伊朗向外擴張的機會，於是所謂「什葉月彎」的擔憂出現在許多遜尼阿拉伯國家政府中。其中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其擔憂伊朗可能藉由伊拉克的什葉勢力向外進行擴張，威脅其在區域的安全利益 (Malmvig, 2014)，於是在一來一往間，沙烏地和伊朗雙方的角力也朝向教派化的框架發展。然而雙方角力之所以可以朝向教派化的論述發展，也是因為宗教認同在中東地區具有重要的地位，並且在近年獲得提升。特別是在 1979 年伊朗的伊

斯蘭革命後，伊斯蘭成為其政體認同的重要部分，也使得伊斯蘭主義的發展被視為是替代泛阿拉伯主義的思潮，作為中東地區再崛起的依歸，同時海灣國家在石油危機後獲取大量財富，吸引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移工到這些國家工作，沙烏地也因此向外輸出瓦哈比主義（Rogan, 2009），而瓦哈比主義本身與沙烏地政權的正當性和穩定性有密切的關係，瓦哈比主義本身也是伊斯蘭的改革運動代表，追求回歸過去伊斯蘭的實踐，同時也是支持沙烏地王室正當性來源的主要勢力之一。於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宗教認同強化，也連帶的使得教派認同較能受到菁英階層的影響，在區域間發揮影響力。

因此在社會層面可見到伊斯蘭認同的加強（相較過去世俗的泛阿拉伯主義模式），宗教的氛圍更加提高，也因此教派的認同更成為個人核心認同的一部份，讓精英階層針對教派認同的操作更有可能（Abdo, 2017）。於是綜上所述，教派認同的強化源自於伊斯蘭在 1970 年代後的復興，對宗教認同度的提升使得中東地區的社會中的宗教氛圍提升。而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朗與沙烏地的角力再度躍上檯面，而上述提到的社會背景也使得菁英階層操作教派的認同成為可能，在區域間形成所謂什葉和遜尼的對立。

而在 2010 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許多國家的政府也利用了這樣的教派認同作為分化反對勢力的工具。例如在巴林，面對反政府的示威運動，巴林政府將反對運動標籤為什葉派運動，並且指控其是伊朗在巴林的滲透代理勢力，這使得一開始有部分遜尼派支持的反對運動遭到分化，反對運動的焦點也轉向教派衝突的方向發展（Stacey, 2017）。而前述也有提到葉門在阿拉伯之春時，出現了跨越教派的反政府勢力，但隨後也是在菁英階層的操作下隨著教派認同產生分裂。相同的手法也出現在沙烏地政府上，分化內部可能的反對勢力（Clausen, 2015）。另一方面，伊朗儘管在過去並不強調教派的分別，也不只利用什葉派的勢力進行對外

的角力 (Abdo, 2017)。然而，在其所援助的什葉團體進行教派衝突的操作後，卻也使得伊朗更陷入所謂什葉對抗遜尼的角力中，而其也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介入伊拉克的局勢，反而和沙烏地陷入一種安全困境的競逐中(Stacey, 2017)。

在葉門內部的部分，除了前述提到的教派化發展外，尚也有部族的認同存在。如同前述，部族在葉門是一種相當古老的社會結構。而由於這樣的結構所提供的強大動員能力，各方政治勢力也會爭取部族的支持來獲得其所提供的動員能力。而就葉門的歷史來看，部族的認同在葉門社會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北部的高地地區，其傳統上較少受到中央政府的支配，而葉門的統治者也常必須藉由平衡各方部族的勢力來穩定政治秩序(Clark, 2010)。而這也指明了中央政府缺乏足夠的權威將其治理投射至葉門各地，並塑造一個穩定的葉門認同，因此內部政治結構呈現一種不穩定的分裂，這樣的分裂也呈現在不同部族之間的競爭，甚至是南北之間的競爭(Freeman, 2009)。而這也反映在阿拉伯之春後的葉門，各地方的勢力在舊有政治平衡被打破下，躍上政治檯面進行角逐，故在阿拉伯之春的初始階段，政治主軸仍舊在傳統地方分裂的範疇。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阿拉伯之春後，儘管年輕示威者曾一度展現跨越部族和教派的團結，但在 GCC 介入提出轉型計畫後，葉門內部這樣的分裂結構也使得在重建政治秩序時，各地方勢力難以達成共識，例如 Houthi 就對新的政治安排表現過多次不滿(Stacey, 2017)。於是，在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初，葉門內部衝突的焦點多是在政經資源以及權力分配的問題上，而非是教派分別本身的衝突(Stacey, 2017)。至於 Houthis 和政府方面的衝突部分，或許 Houthi 本身運動的訴求在地方的層次上帶有教派的色彩，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衝突點或許是所謂 Sayyidis 和非 Sayyidis 之間的衝突` (Sayyidis 為過去葉門傳統王室部族成員)，這樣的衝突可追溯至 1962 年的北葉門內戰，也因此葉門內部本身的衝突已有相

當久的歷史，而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Philips, 2013)，因為一連串內部和外部行為者的作用和互動，使得整場衝突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如同前述提到的，菁英階層透過教派化的論述框架，分裂一開始反政府勢力，隨後在外部行為者的支持下，衝突發生了教派化的傾向。

綜上所述，我們可將主要的行為者界定在以下四方。在外部行為者方面，主要有沙烏地和伊朗。在沙烏地方面，其主要透過教派化的操作，將自身定義並強化遜尼派的認同，此外其本身內部和瓦哈比主義的結合也使伊斯蘭在其政權上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伊朗自 1979 革命後則具備伊斯蘭神權政治的特徵，對外也向什葉派的團體進行援助，儘管其對什葉團體的支持源自安全考量與權力平衡，但在教派化的發展下，其成為所謂什葉勢力的領導者，至少以沙烏地為首的許多阿拉伯國家是這樣認知的。而在葉門內部方面，主要的行為者有政府方的 Hadi 政府，另一邊則是 Houthis。政府軍一方代表的除了是舊有政治菁英的一方，也代表了所謂非 Sayyidis 的勢力。而 Houthi 方面，其源自於一支 Zaidi 什葉派的勢力，訴求為爭取 Zaydism 的文化權利，此外也代表了 Sayyidis 一脈。而在這場內戰的衝突中，上述的認同形塑了內外行為者間的互動，並以這樣的認同形成了安全困境的關係，而這些行為者間的互動也強化了上述的認同。此外，葉門內部不同行為者的競爭下，也連帶牽連了外部行為者的參與，進一步形塑了這場葉門內戰。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在這場內戰中，內外行為者如何因這樣的安全困境，產生進一步的牽連，使內外部的因素和動力共同形塑這場內戰。

第三節 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政治安排的僵局

上述提到認同的安全困境使得葉門內戰中的內外部因素與動力互相牽連共同形塑了這場內戰。而欲探討這樣的過程，則必須先從內部與外部的安全困境之形成開始討論，最後進而討其如何交互作用，形塑葉門內戰，因此本節將從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開始討論。而 2014 年後的葉門內戰主要參與者是所謂 Houthis 與葉門 Hadi 政府，Houthis 和國際支持的 Hadi 政府間的衝突主要來自對阿拉伯之春後的新政治安排無法達成共識。然而，Houthis 和中央政府間的衝突早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就已存在，並也因此發生過數次的武裝衝突¹²。因此，有必要檢視在阿拉伯之春前 Houthis 運動的起源，以及其和葉門政府間的衝突和互動，並討論阿拉伯春後 Houthis 和葉門政府間互動上有怎樣的發展，以及其之間互動和認同建構的交互作用，以便能更了解 2014 年葉門內戰的內部認同安全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教派間的分歧傳統上並非葉門政治上的主要核心議題，然而在相當地方的層次上，葉門北部的 Houthis 運動的起源是具有教派意義的(Albloshi, 2016)，Houthis 所信仰的是什葉派的 Zaydism 分支¹³。而 Zaydism 在葉門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在 1962 年遭到軍官發動革命推翻前，Zaydism 即是當時什葉王朝的主要信仰，而葉門則由受認可的伊瑪目統治。而 Houthis 又為所謂 Sayyidis 的部族所組成，Sayyidis 為主要的王位繼承者和王室(Freeman, 2009)。然而在 1962 年的軍官革命後，葉門的王室就遭到推翻，成立了共和政府。而作為傳統政治菁英階層的 Sayyidis 被迫讓出政治權力，和其他非 Sayyidis 共享。而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則主要是非 Sayyidis

¹² 在 2000 年代時，Houthis 就與前總統 Saleh 政府發生過數次武裝衝突，而後更使得沙烏地介入前面兩者的衝突之中，制衡 Houthis 的勢力 (2008، الأنسانية)。

¹³ 然而並非所有信仰 Zaydism 什葉派者皆為 Houthis 的支持者，也有其他 Zaydis 是支持中央政府的。Zaydism 的起源可以追溯自西元 8 世紀，而現今在葉門約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口信仰 Zaydism 這一派的什葉分之 (2008، الأنسانية)。

所組成，而在 1990 年代和南葉門合併後，一直是主要的政治菁英階層，葉門阿拉伯之春前的總統 Saleh 即為非 Sayyidis 的 Zaidis (Freeman, 2009)。

而當時 Houthis 被葉門的中央政府視為威脅，認為其會威脅政治秩序的穩定，並與其發生過數次的武裝衝突。而就 Houthis 方面而言，其運動訴求主要是源自於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邊緣化(Stacey, 2017)，並恐懼沙烏地所主導的薩拉菲勢力會影響其在葉門北部的地位和滲透(Salmoni, 2010)¹⁴，此外，在葉門政府配合美國執行反恐戰略的背景下，Houthis 也具有反美國和以色列的色彩。因此我們可以看到，Houthis 和政府的衝突起源在認同層次上大概可以鎖定在兩方面，一是在宗教層次上對於自身政治文化的邊緣化和排擠，另一面則是部族的層次上舊菁英的反抗。然而在葉門政府在面對這樣的挑戰時也會將 Houthis 指稱為伊朗的代理團體。於是可以看到，政治菁英具有將論述的框架限定於教派衝突上，於是衝突越發向宗教面傾斜，也因此具有朝向教派化發展的可能，在內部層次上形成教派認同的安全困境。而這樣的教派化發展，或許在阿拉伯之春前並未成為葉門內部政治的主軸，但在阿拉伯之春後教派化的傾向卻逐漸明顯，使得整體內部的認同安全困境出現轉移。

而在阿拉伯之春後，葉門進入了政治權力重分配的協商過程。在由 GCC 的介入下，提出了葉門的政治轉型計畫，其目的是要讓葉門內部的各方政治勢力進行協商，進行政治轉型 (Pardhan, 2017)。雖然這樣的計畫受到國際各方的支持，聯合國方面也努力促成談話，但在阿拉伯之春後上台的 Hadi 政府，儘管受到國際的承認，卻在新的政治協商過程中，和 Houthis 無法達成共識，其主要是因為 Houthis 在這過程中感到被邊緣化，其訴求無法被納入新的政治安排，另一方面，

¹⁴ 薩拉菲主義(Salafism)為當代遜尼改革派的一脈，其發展的起源可追溯至 19 世紀為對抗歐洲殖民勢力的一種回應。其強調回歸伊斯蘭在七世紀創始之初的精神，而穆斯林應回歸到伊斯蘭初期的實踐，是一種「宗教純淨化的運動」。沙烏地長期透過薩拉菲主義為其在葉門內部散佈宗教影響力的途徑(Hourani, 2010)。

Hadi 政府也對其無法產生信任，因此在一來一往間，Houthis 與中央政府間的互信無法建立，雙方的鴻溝便越來越深(Hill, 2017)。

另一方面，其實在阿拉伯之春開始爆發時，上街頭抗議的青年是跨越各階層和教派的，我們可以看到所謂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反抗運動結盟並商討對策，其展現的是針對長久以來葉門政治菁英腐敗和政府失能的不滿，要求建立含納人民聲音的新政治秩序。然而新的政治權力安排卻未融入阿拉伯之春時街頭抗議的年輕人所展現出的聲音，政治權力只是從一群舊菁英的手上轉到另一群舊菁英的手中，而當時抗議所展現的短暫團結也被上述教派化的過程分化(Hill, 2017)。因此，Houthis 也在 2014 年有關政府補貼取消的抗議中夾帶著反對的聲勢，圍攻首都沙那，內戰就此爆發(Hill, 2017)。然而在內戰爆發後，政治菁英階層卻也採取了教派化的論述框架，將衝突議題逐漸設定在所謂教派的衝突上，而這使得葉門內部的衝突呈現教派化的趨勢(Stacey, 2017)，阿拉伯之春時所呈現的跨教派團結的認同被瓦解，教派的分歧被凸顯，也似乎進一步形成一種內部認同上的安全困境，這樣的認同安全困境是以教派認同為依歸，與過往的情況出現轉移。

在葉門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雙方的衝突在認同上似乎形成一種安全的困境，即所謂區域間的什葉和遜尼的衝突。然而單純從教派的分歧做討論反而過度簡化了衝突的維度，原因在於 Houthis 所屬的 Zaydism 相比伊朗的什葉派更接近遜尼派 (Clausen, 2015)，且前總統 Salih 也是屬於什葉派的，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雙方認同和互動間的形塑過程，才能完整對內部認同困境形成的討論。

首先，葉門內部的政治環境其實相當鼓勵內部不同認同分歧的發展，葉門社會本身就受部族結構影響甚深，且過去的政治傳統也以所謂部族政治作為依歸(Dersch, 2001)，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勢力常具有較強的自主能力，與中央政

府競爭權威性。因此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更聚焦在地方，與對葉門做為國家整體的認同相互競爭。部族於是成為葉門社會一個重要的認同單位，形成不同的認同團體，相互競爭。而 Houthis 和所謂葉門共和政府的衝突是具有部族層面的維度的，Houthis 主要過去是所謂的 Sayyidis 一脈，在過去是北葉門什葉王朝主要的王室成員，而在阿拉伯之春前的葉門共和政府則可溯源至 1962 年北葉門內戰時成立的共和政府，其主要是非 Sayyidis 為依歸。

對當時的總統而言，Houthis 所代表的是共和前的舊政治菁英，對其政治動機存有猜忌(Clausen, 2015)。但另一方面，對 Houthis 而言，其運動的訴求起源是具有有一些宗教意涵的，在檢視其運動的意識形態下，可以發現其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推估其原因可能是過去在什葉王朝的時期，宗教是作為政治權力的主要來源，此外，另一個說法也提到沙烏地的影響力。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後，沙烏地藉由新獲得的財富直接或間接的對外輸出其瓦哈比主義(Abdo, 2017)，這當然也包括了葉門。而 Houthis 的運動也源自於其對瓦哈比或薩拉菲勢力的介入感到憂慮，擔心其文化權力會邊緣化，另一方面，葉門政府在回應 Houthis 的運動時也多次以伊朗什葉派代理人來指稱 Houthis(Clausen, 2015)，儘管他們和伊朗的什葉派關係並非那麼接近。

因此，在政治和文化兩個層面上對邊緣化的擔憂，促成了兩方之間的衝突，而政府單方面的以教派衝突的回應，更是強化了雙方衝突的層次，兩者之間跳脫不開將彼此視為敵對的局面。而這樣的情況更是在阿拉伯之春後變得更加明顯，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葉門的青年抗議曾展現短暫的團結，卻在後續的政治過程中被邊緣化了，並且又再次被所謂教派衝突的議題所框架，這部分有很大的原因和區域間外部的行為者有關，這將在下節做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就認同層面來說，教派的認同的差異本身在葉門過去的政治舞台上，並非傳統的核心議題所在。反之，部族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更是深深地影響葉門的政治穩定。而 Houthis 的出現，其在認同層次上是帶有部族和宗教文化兩個層次的，然而雖然其在地方層次上雖帶有宗教的色彩，但其核心仍可能和政治文化權力更有關。然而，隨著 Houthis 和政府方面的對立加劇，兩者間的衝突越來越強調宗教層面，並逐漸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

因此可進一步說，Houthis 和葉門政府間的衝突建立於葉門本身部族社會結構下所導致的政治競爭的分裂，Houthis 與政府競爭的是對政治權力分配現況的改變與否，宗教認同的強度是在此過程中強化，使衝突逐漸朝向教派化發展。這種教派化的發展除了 Houthis 可能具有的意識形態外，也受到了政治菁英的框架作用，尤其葉門政府曾多次指控 Houthis 為受到伊朗支持的什葉代理人，但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Houthis 的起源其實是相當地方的，其和伊朗的關係並非所想像的那樣接近。而在阿拉伯之春的初期，在對舊有菁英的不滿下，葉門出現了跨教派的團結運動。然而教派化的發展卻也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雙方也在角力的過程中不斷強化教派認同的競爭，也分化了抗爭的勢力，而至於探討其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的原因，有一部份也是受到區域間的政治角力和動力的影響。

第四節 外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教派衝突的建構

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其主要的認同在過去並非以教派分歧為衝突的主軸，很大層次也受到部族的影響和作用(Day, 2012)。如前所述，葉門內戰爆發後，內部的衝突卻不斷朝向教派化發展，有一部份的因素來自政治菁英的作用，且其中有許多是來自外部的影響力，特別是沙烏地與伊朗在區域間的競爭。因此本節在此欲討論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如何吸引了沙烏地與伊朗的介入，同時討論沙伊兩國

之間的角力如何衝擊葉門內戰的發展，特別是在教派化的發展上，沙伊角力的外部安全困境對葉門內部具有怎樣的衝擊。

在外部層次上，如同在前述所提到的，中東地區在 1970 年代以來，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逐漸提升，整體社會的氛圍朝向宗教更加濃厚，因此宗教認同在社會層面上提升，對於形成教派衝突提供了基底(Abdo, 2017)。而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開始興起所謂教派衝突的討論(Clausen, 2015)。面對海珊政權的垮台，在中東地區出現權力真空的情形下，以沙烏地為首的遜尼派國家開始擔心伊朗會藉此向外擴張，也讓這些國家擔心伊朗藉由什葉派所投射的影響力會損害這些阿拉伯國家政府的影響力(Abdo, 2017)。此外，伊朗也採取藉由資助海外什葉團體作為進行權力平衡的措施¹⁵，然而由於這些團體在社會層面的號召能力強，同時意識形態色彩鮮明，也使得伊朗無法完全掌控議題設定的能力(Stacey, 2017)。

同時，對沙烏地而言，其也擔心伊朗藉由什葉團體在中東地區的滲透，甚至是對其國內造成威脅。沙烏地境內的什葉派多在東部地區沿岸，也恰巧是石油蘊藏地所在更是沙烏地的經濟命脈，因此也會害怕伊朗的影響滲透，因此為抵抗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意識形態，其也對外輸出其宗教影響力，同時也資助遜尼團體來抗衡伊朗的影響力(Mabon, 2018)。因此在上述的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下，逐漸形成區域間認同安全困境的產生。首先，沙烏地和伊朗在區域層次上，兩國在自身安全的考量上各自資助了什葉和遜尼的團體，而之所這樣的資助能產生作用，在於宗教認同於中東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帶來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Abdo, 2017)。於是本文認為，在這樣過程中，沙烏地和伊朗有意無意地強化了自身教派認同的色彩，也加劇了教派間的分歧，使得教派認同的強度更加提升，形塑了

¹⁵ 伊朗在支援境外團體勢力時，起主要手段與其說是支持「什葉派團體」，不如說是支持任何具有修正主義傾向的團體，挑戰既有美國在中東地區所建立的勢力。只是在教派團體具有強力的社會號召力下，伊朗也未能控制其意識形態的發展(Juneau, 2016)。

伊朗和沙烏地在區域間的角度。

上述這種教派間的角度更是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如同前述所提到的，面對可能的革命和示威，許多遜尼派王權國家以教派間的分歧作為分化反抗勢力的手段(Stacey, 2017)。其將反抗勢力指涉為伊朗的境外什葉代理人，分化可能團結的反抗勢力。另一方面，伊朗也大力支持過往的什葉派盟友，例如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以及伊拉克境內部分的什葉團體(Abdo, 2017)。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阿拉伯之春從所謂反政府示威的運動，也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然而，這樣的發展卻也非單純的一夕間政治菁英階層的影響所致，本文認為，前段所提及的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早已經強化了教派的認同和分歧，因此阿拉伯之春後的教派化發展，為前述伊朗和沙烏地角力強化下的認同安全困境的延伸，政治菁英階層只是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挑動早已存於社會間的教派分歧，否則這種透過操弄教派分歧來分化反抗勢力的手段會難以施行。此外，對於政權被顛覆的恐懼，也強化了對遜尼派政權對什葉勢力的猜忌，而伊朗也大力援助自身的盟友，因此在一來一往間，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遜尼和什葉相互對抗的模式。

而當我們透過上述的角度進而討論葉門問題時可以發現，阿拉伯之春後所爆發的內戰對沙烏地和伊朗兩國而言，各具有其意義。對沙烏地而言，首先就是關於安全的考量。葉門作為與其邊境接壤的國家，葉門的穩定與否直接影響了沙烏地的邊境安全(Pardhan, 2017)。而在過去，沙烏地即透過其宗教和部族網絡的影響力，介入葉門的內部事務，並以維持一個分裂的葉門為目標。而 Houthis 則一直被沙烏地視為伊朗的代理人，並在過去 Houthis 和葉門政府的衝突間，選擇支持政府一方，因此兩者間也有利益上的衝突(Pardhan, 2017)。

而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固然邊境的安全是沙烏地的重要考量，但 Houthis 的出現本身之所以會帶來安全上的威脅，還是得歸因於上述所提到的認同角力。沙烏地和伊朗在競爭的過程中不斷強化遜尼和什葉的認同，並使這兩組認同陷入安全困境的角力，意即沙烏地和伊朗分別在角力的過程中，透過使用教派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進而確認了自身分別作為遜尼和什葉勢力領導者的角色。因此當葉門內部出現一組什葉武裝勢力，對沙烏地而言自然具有強烈的威脅色彩，同時藉由將 Houthis 指稱為伊朗代理人也更能號召反對 Houthis 的勢力。雖然在另一方面，伊朗和 Houthis 之間的結盟似乎較為隱晦，且過去彼此間的連結和淵源也未必那麼緊密 (Pardhan, 2017)，反而葉門的 Houthis 所奉行的 Zaydism 和遜尼派更為接近 (Freeman, 2009)，然而沙烏地還是積極介入，本文認為原因在於沙烏地已經陷入認同的安全困境中，以至於其對於 Houthis 的認知為對其有威脅的伊朗什葉代理人，在這種強烈的認知下，必須針對其作出制衡。

而在伊朗方面，其最初是基於不對稱平衡的戰略邏輯下，支持區域內的什葉勢力，然而這樣的舉動卻也讓其陷入與沙烏地進行教派認同的角力。而伊朗對葉門 Houthis 的支持是相對間接的，其原因在於對於伊朗而言，全面支持 Houthis 所需要的成本將高於所帶來的利益，並且可能引發沙烏地對其的全面開戰。但若是進行小部分的支持，將可以有效的擾亂沙烏地所建立的既有秩序，以此制衡沙烏地 (Mahjoob, 2016)。而儘管伊朗在意識形態上伊朗可能對 Houthis 有影響力，但如同上段所提到的，Houthis 的運動有其內部動力，但是伊朗針對 Houthis 所採取的支持，儘管是間接的支持，對沙烏地而言也強化了 Houthis 作為伊朗代理人的認知，於是在這樣的互動中將葉門帶入了沙伊兩國的認同角力間。而伊朗和沙烏地也因此加速了葉門內部團體競爭的教派化。因此可說沙烏地與伊朗兩國的介入，使得前述提到的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教派化上，具有加速的作用，使葉門內部衝突脫離傳統主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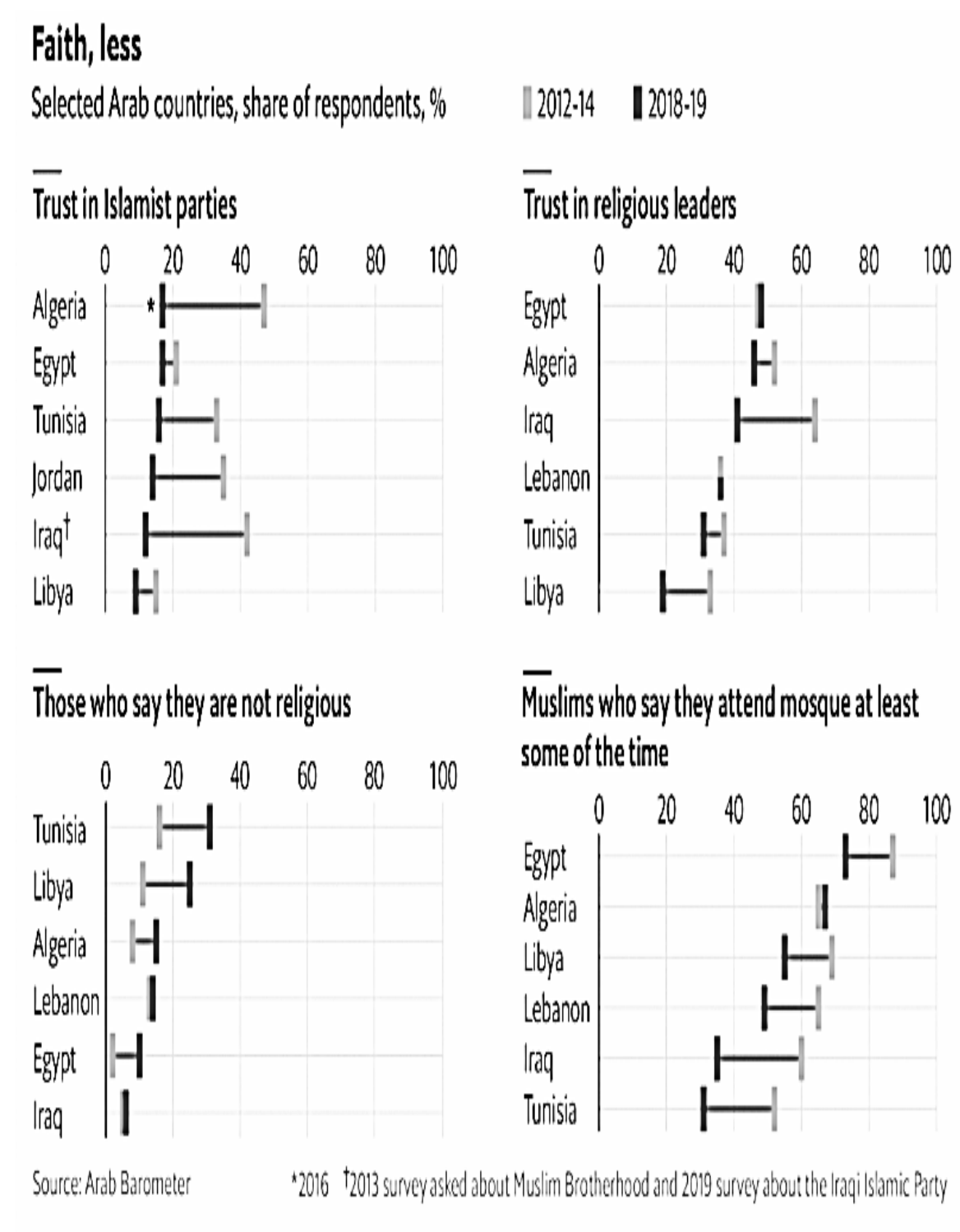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教派認同隨著中東地區 1970 年代後的伊斯蘭認同強化，宗教認同之強化，形成教派認同強化的背景。而在 2003 年後，中東地區隨著沙烏地和伊朗的相互角力下，雙方相互資助遜尼與什葉團體，對外輸出其影響力。於是在彼此的互動下，雙方建立了一種遜尼與什葉的教派競爭的互動關係，也強化自身的教派認同色彩。而這樣的互動關係也在阿拉伯之春後產生進一步的激化，沙烏地和伊朗藉由資助境外勢力，進一步進行角力，而許多阿拉伯政府也透過操弄教派的分歧來分化反對勢力。而在葉門，Houthis 的出現對於沙烏地而言，視為對其邊境安全的重大挑戰，同時視其為伊朗在葉門的代理人，因此必定會進一步進行制衡。而對伊朗而言，其支持 Houthis 也可在地緣上制衡沙烏地，但其對 Houthis 相對來說較為間接和隱晦。然而大國的介入自然也強化了葉門內部衝突的教派傾向，儘管過去葉門政治的主軸多非在教派的分歧上，但大國的介入加上政治菁英的主導，也使得葉門內部的衝突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

本章此大致呈現了 2014 年葉門內戰的教派化進程，以及內外的認同安全困境在這其中所扮演的形塑能力。然而，本章最後必須得再次強調，上述這種教派化的進程大多是由上而下的一種建構，至於底層民眾是否真的接受這樣的認同建構則有待未來的觀察。根據 Arab Barometer 的調查資料顯示，中東地區近年來宗教性政黨的支持度可見下降。當然這不能代表教派化的進程因此趨緩，或是中東地區人民的宗教認同度下降，但或許這樣的調查結果顯示了人們對於宗教在政治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產生一些態度的轉變，因此未來教派衝突的論述框架是否還能為菁英階層所操作，是有待觀察的。

下頁圖即為 Arab Barometer 針對中東北非地區幾個國家(阿爾及利亞、埃及、突尼西亞、約旦、伊拉克和利比亞)人民對伊斯蘭政黨支持度、宗教領袖信任度或是宗教虔誠度的所做的調查，其中淺色部分為 2012 至 2014 年的資料，而深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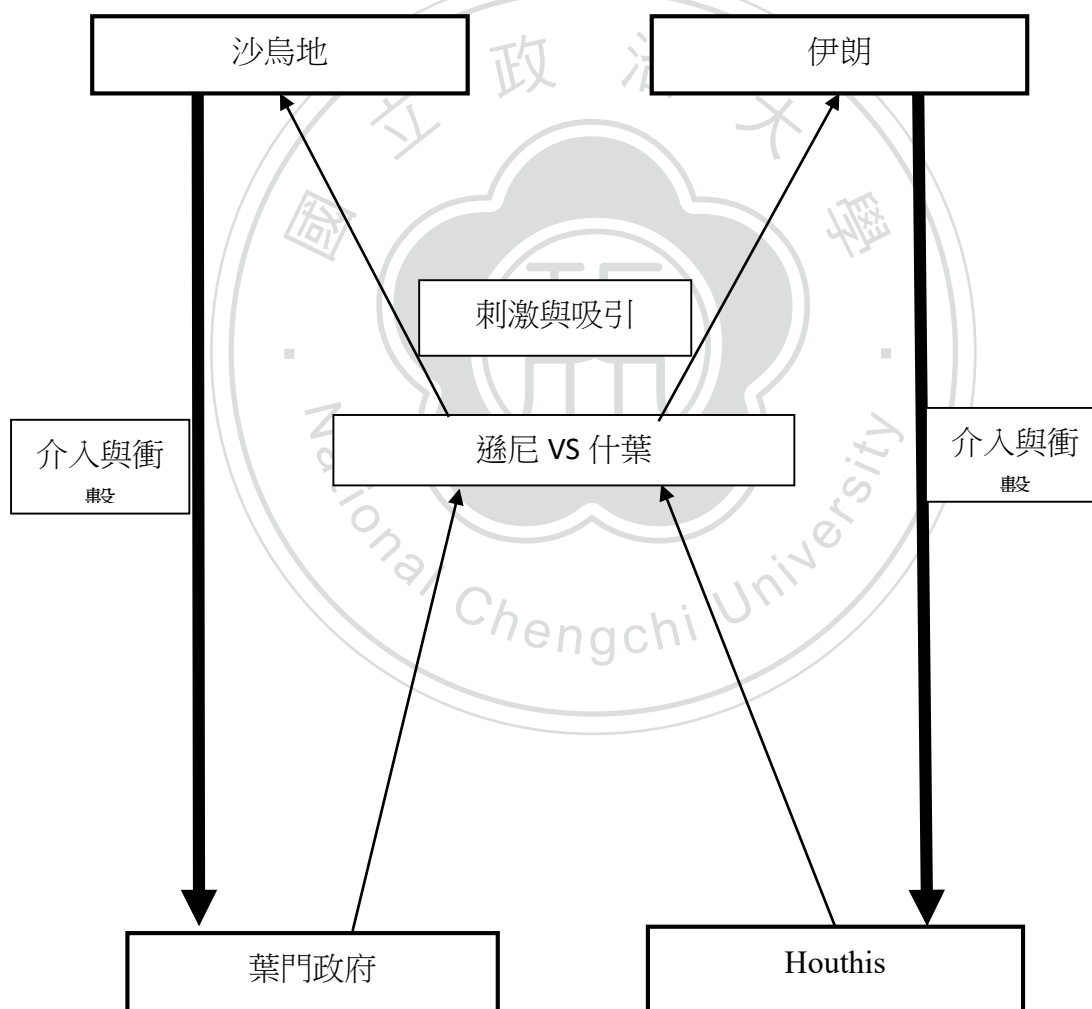
分別為 2018 至 2019 年的資料。透過圖中的資料可以看到在近幾年許多國家對於伊斯蘭政黨、宗教領袖信任度或是宗教實踐或虔誠度上有下降的趨勢。

圖 3-1 宗教政黨信任度等調查(來源: Arab Barometer)



最後，本節所敘述的這種內外層的認同安全困境可以整理如下頁圖二：在圖中可以看到葉門政府和 Houthis 的競爭透過遜尼和什葉這兩種認同吸引了外部行為者沙烏地和伊朗的介入，因為後兩者在外部的層次上也有這種認同的競爭。而在區域行為者介入後，可以看到他們對內部行為者的衝擊。而由於外部行為者所具有的認同建構能力更強，圖中便已較粗的實線顯示，以凸顯他們限縮內部行為者認同建構的能力。

圖 3-2 認同內外安全竟相互回應之結構



第五節 認同的內外互動：動機與影響

綜歸本章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葉門內戰中所展現出來的內部分歧有長遠的歷史。Houthis 和葉門政府之間的衝突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已存在。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到葉門內戰也被捲入於沙烏地和伊朗的角力之中。而這樣的角力以一種遜尼和什葉互相對抗的模式進行。然而，若我們只是將葉門內戰視為區域間大國角力的延伸，會忽略了葉門內戰所展現的內部因素和動力，以及葉門內部分歧如何吸引外部國家進行介入的原因。因此本文認為在葉門內戰中，存在著內部與外部的動力，而這兩股動力如何相互影響是本章的重點之一。同時，這兩股動力也都延續著某種認同的界線進行影響。認同的本身，特別是教派認同可能並非葉門內戰雙方或沙烏地和伊朗的衝突起點，但卻大大的形塑了衝突以何種方式呈現，同時影響了衝突各方對於利益的界定，進而影響各方行為者的動機。因此，探討認同如何在外部與內部的兩個層次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葉門內戰中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的互動。

中東地區在伊斯蘭認同的強化下，使得當沙烏地和伊朗的角力浮上檯面時，其同時也以教派認同作為雙方向外擴展影響力和制衡彼此的工具，同時也確立和進一步強化了彼此的教派認同，回過頭來界定了自身的角色和利益，並逐漸形成一種遜尼和什葉對抗的認同安全困境。而這種認同上的競逐更是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其是因為區域間國家為分化可能的反抗勢力，更是進一步挑起教派認同的歧異，以求分化原本團結的反抗勢力。而在葉門內部，教派認同長期以來並非葉門政治的主流議題。反之，部族和地方勢力針對資源和政治影響力的競逐才是主軸。然而，Houthis 和葉門政府的角力並非完全沒有宗教層面的因素。在相當地方的層次上，Houthis 的運動本身具有濃厚的什葉派意識形態。但是，若單單只是將 Houthis 和葉門政府的衝突簡單歸類為沙烏地和伊朗間遜尼和什葉的衝突一

環並不能完全解釋其貌，因為 Houthis 和中央政府的衝突也帶有部族色彩。同時在阿拉伯之春初期，葉門反抗勢力是團結了跨教派的各方行為者，其呈現的是統一的葉門認同，然而在政治菁英的影響下，後續政治安排協商和角力的過程中卻又再一次分化這樣的一統，並出現了上述提到的教化的過程，使教派認同出現強化，Houthis 被指為伊朗的什葉代理人，內部認同安全困境出現教派化。

同時這樣內部的衝突也吸引了沙烏地與伊朗的介入，因其回應了兩者在區域間的認同競爭，Houthis 被沙烏地視為伊朗在葉門的代理者，嚴重影響它邊界的穩定和安全，因此選擇大力介入。而對伊朗而言，透過對 Houthis 的間接支持有地緣政治上制衡沙烏地的作用。而在沙烏地與伊朗的介入後，兩國在葉門內戰中扮演強力的認同形塑角色，其和政治菁英共同將葉門內部的衝突帶向教派競爭的維度，葉門內部本身的安全困境因此以遜尼什葉對抗的角度呈現，在認同層次上逐漸脫離過去的政治主軸。

最後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葉門內戰中，同時具有外部和內部的動力在形塑這場衝突。而這兩股動力分別以不同的認同角力呈現，在外部是沙烏地和伊朗的對抗，以遜尼和什葉的認同進行角力，而在內部是 Houthis 和葉門政府的衝突，其過去原本是以宗教和部族等不同的認同進行角力，然而阿拉伯之春後這樣內部的分歧吸引了外部國家的介入，是故內部的動力吸引了外部力量的進入，然而在外部力量的進入後，其和本地政治菁英結合，進一步形塑了葉門內部本身的衝突，並導向教派衝突的層次，也因此我們可以說，是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吸引了外部行為者因自身外部安全困境考量的介入，而外部行為者的介入卻也改變葉門本身的安全困境的型態，使其更朝向外外部安全困境的方向發展，而在葉門的例子中，則是使其朝向遜尼什葉的教派衝突發展，因此可得知在這場葉門內戰中，外部行為者具有相當強的認同形塑能力，並且限制和衝擊了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形塑能力。

然而，如同本章所提到的 Arab Barometer 對宗教政黨支持度的調查一般，可以見到中東地區對所謂宗教政黨的支持度在這幾年有所下降的趨勢，但這是否顯示了區域內教派化程度的趨緩則有待觀察。因此，上述這種教派化的發展是否能在葉門內部持續深化則必須再看未來葉門內部自身是否接受這樣的認同建構，特別是在外部行為者退去後，葉門內部會不會如同 1962 年一般重新建立自身的認同，是未來有待觀察的一部份。



第四章 兩次內戰的延續與變化

本文至此檢視了 1962 年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我們皆可以看到內外部行為者相互吸引和互動的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互動形塑了這兩次內戰中的認同發展。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可以看到葉門內部行為者為葉門阿拉伯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 YAR）與王室和保皇派，而中東地區外部行為者則是埃及與沙烏地兩國，而在 2014 年後的內戰，則是有受國際支持的葉門政府、Houthis 以及外部的沙烏地和伊朗兩國等。他們彼此在內外部進行認同的競爭，其中葉門內部的競爭和衝突也吸引了外部行為者的介入，最後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也對葉門內部的認同衝突產生影響。而以下本文將進一步對這兩次的葉門內戰進行比較，來分析這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認同安全困境有什麼發展上延續的模式，以及在時空的變化下又有什麼樣的改變。透過對這兩次內戰的比較，將可以更加確立認同的內外安全困境如何在葉門形成，並形塑不同衝突的發展，同時也能更加確立葉門本身內部的環境對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又有何影響，並且檢視葉門自現代國家形成以來，其內部分裂模式的發展。因此，本節在以下首先將對這兩次的葉門內戰的比較基礎做闡釋，並依據 Mabon(2018)的三階段分析，檢視在不同的階段下，兩次葉門內戰中認同安全困境的發展上有何改變和延續。

第一節：比較基礎的建立

本文選擇 1962 年以及 2014 年的葉門內戰進行比較，其比較基礎建立於以下：首先，在範圍的部分兩者具有大致的重疊。1962 年北葉門內戰主要發生於當時的北葉門地區，南葉門當時還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其在後期雖然獨立，但尚

未對當時北葉門的內戰造成太多衝擊。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雖說南葉門此時已和北葉門統一多年¹⁶，但 Houthis 運動主要的發源範圍以及其和中央政府的衝突仍主要是集中在葉門北部 (Freeman, 2009)，故兩者在範圍上有大致的重疊。

第二，在行為者方面，兩次的葉門內戰都發生在政治秩序劇烈動盪後，並且是由新舊政治菁英形成的衝突所引發。在 1962 年的內戰時，是由剛革命成功的 YAR (Yemen Arab Republic) 政府與被推翻的王室所形成的衝突，而在 2014 年的部分，則是由轉型計畫下新成立的 Hadi 政府與爭取加入新政治秩序的 Houthis 進行角力 (Hill, 2017) (南方分離運動在過程中雖有數次和新政府分裂，但主要仍是與 Hadi 為盟)。同時在對外方面，過程中皆有來自區域間的外部行為者介入支持。在 1962 年時，有埃及與沙烏地兩國的介入，分別支持 YAR 與王室陣營。而在 2014 年時，則有沙烏地和伊朗的介入，分別支持 Hadi 政府與 Houthis。此外，在內外部的互動過程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認同分歧，無論是 1962 年葉門內戰中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之爭，又或是 2014 年的什葉遜尼對抗 (葉門內部主要是以新舊勢力的競爭為主，但後來的發展呈現教派化的趨勢) (Stacey, 2017)。

最後，在整體的內部環境方面，葉門始終維持者某種政治的分裂性，無論是統一前還是統一後，其內部一直缺乏完整有效的中央權威，部族在社會上仍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地方勢力也具有相當的自主性，有時甚至獨立於中央的法治權威之外 (Day, 2012)，因此在對葉門進行統治時，中央政府皆須維持某種各方勢力的平衡，才能對葉門進行安全的治理。

而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比較兩次內戰在於內外認同的安全困

¹⁶ 南北葉門在 1990 年 5 月 22 日統一成為葉門共和國 (Republic of Yemen/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並由原本北葉門的總統 Saleh (Ali Abdullah Saleh, 即葉門在阿拉伯之春下台的總統) 擔任新任總統，治理統一後的葉門 (Dresch, 2005)。

境上，其形成過程中有何異同，並進一步討論其對內戰形塑的影響。而在經過對這兩次葉門內戰的檢視後，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差異之處。首先在於時空背景的變化，在 1962 年時，南北葉門尚未統一，當時葉門的國族認同也尚未出現完整的統一 (Dresch, 2005)，2014 年的葉門內戰之前，葉門於阿拉伯之春時曾發展出跨越教派的一統認同，雖然在那之後葉門內部又陷入分裂的情形 (Stacey, 2017)，但相較 1962 年，葉門的國族認同已經較為深化，但始終未能建立完整的中央集權國家 (Day, 2012)。這種稍微深化的國家統一認同是否會形成較不分裂的環境，則有待進一步釐清。

其次，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認同安全困境，在於依附的認同上也有所差異，1962 年的內戰是關於泛阿拉伯主義、伊斯蘭王權、部族與中央的認同競爭 (Stookey, 1978)，而 2014 年的內戰則同樣是關於中央、地方與部族等不同認同的競爭，此外在衝突教派化後也包含了遜尼和什葉的競爭 (Stacey, 2017)。而不同的認同將形塑認同的內外安全困境，並進一步型塑了兩次內戰。沿著不同的認同是否對內戰的形塑有不同的影響也是本章欲探討的重點。最後，儘管兩次皆有外部行為者之介入，但各行為者其介入程度上卻又有些微的差異，這樣的差異與認同安全困境的關係也將會進一步討論。因此，在以上的基礎下，本文以下將以 Mabon 所提及的三階段分析，針對兩次葉門內戰中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進行比較，分析在兩次的內戰期間上述提到的異同，並在這三階段的過程內，對於內外認同安全困境產生影響，進而探討 1962 和 2014 年兩次的內戰有何變化和延續。而上述的這三階段的分析可以檢視於下圖。如圖所示，本章將根據以下架構，透過三階段的比較分析，探討葉門在現代發展上，認同與區域間安全關係的變化與延續。

圖 4-1 比較架構圖



第二節：第一階段——認同的形成背景

一、1962 年葉門內戰

在 Mabon 的第一階段分析中，其將檢視認同形成的背景與來源。而無論是中東區域間或是葉門內部，其環境皆提供了認同的形塑要素，特別是其人工疆界的因素，讓區域內的國家除了面對內部不同認同的競爭，也要在外部與他國的認同競逐。透過對這些要素的探討，可以更加確定不同行為者其認同形成的背景和本質，以便更清楚瞭解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動力，為後續的認同安全困境打下基礎。

首先在 1962 年的內戰中，當時葉門內部已經面臨了自 1950 年代以來政經情況惡化下，長期對王室執政的不滿，這些不滿提供了革命運動崛起的基礎。同時，葉門內部也欠缺完整對國家統一的認同 (Dresch, 2005)，許多地方勢力立於國家中央政府的權威之外各行其事。其中部族為明顯的勢力，其為葉門內部久遠的社會結構，並對於政治動員能力有很深的影響，且常常在一定的範圍內獨立於國家權威之外 (Swagman, 1988)，政治行為者也常必須爭取部族支持。因此葉門內部自然提供了一個多方勢力進行競逐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YAR 的崛起挾帶了改革的思潮與意識形態，同時也受當時流傳於區域間的泛阿拉伯主義影響，試圖透過共和的建立來建構葉門的國家認同，整合各方勢力 (Orkaby, 2017)。另一方面，葉門當時的王室其歷史深遠，為葉門傳統的 Zaydis 什葉派王國，其和北部的地方傳統部族有很深的連結，而王室本身則為 Sayydis 一脈。早期王室在面對多方的改革聲浪時，也曾出現試圖含納泛阿拉伯主義認同的舉措，特別是其中針對反帝國主義的部分，也被王室運用來抵制英國的殖民勢力 (Dresch, 2005)。然而，因為泛阿拉伯主義中含有對抗反動與王權的思想，這樣的思潮最終卻可能危及其統治權正當性，於是王室也重新回歸其傳統身分，以伊斯蘭作為依歸來抵制

或制衡泛阿拉伯主義的改革勢力（Orkaby, 2017）。

而在外部層次上，1962 年時的中東地區主要有兩股競爭的跨國界認同，一是上述提到的泛阿拉伯主義思潮，強調阿拉伯民族的團結，以此作為反殖民的主要途徑，同時其在政治光譜上也傾向社會主義並以埃及等共和政體國家為主要代表國家（Rogan, 2011）。另一方面則是以沙烏地和約旦等王權國家為代表，其大部分以王權做為主要政體，同時在思想上也較偏向伊斯蘭價值和保守（MacQueen, 2013），沙烏地更是認為，團結阿拉伯民族必須以伊斯蘭為依歸，並以伊斯蘭價值制衡泛阿拉伯主義在區域內的影響力（Menoret, 2017），然而這並不代表沙烏地否認阿拉伯民族認同的重要性，或是埃及就完全稟棄伊斯蘭，而是他們兩者相對地強調其中一種認同（حسن، 2008）。以上這兩股認同在區域間劃分了不同的陣營，並進一步與當時的全球冷戰連結，蘇聯與埃及較為靠近而沙烏地則受到美國的支持（MacQueen, 2013）。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前述中東地區人工疆界的關係，認同團體的存在是跨越國界的，因此這些國家內部都會受到區域內跨界認同的挑戰（Hinnebusch, 2014），而在沙烏地與埃及內部，也並非完全單一的國家認同，沙烏地內部也具有受埃及影響的泛阿拉伯主義勢力，其主要民族仍是阿拉伯人。而在埃及內部伊斯蘭有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同時也有受沙烏地支持的伊斯蘭團體，這樣的情況也使這兩國在區域間推動各自的認同，並形成後續認同安困境的基石。

二、 2014 年葉門內戰

而在 2014 年所爆發的葉門內戰中，葉門可大致分為三方勢力：轉型計畫下的 Hadi（Abdrabbuh Mansur Hadi）政府、Houthis 以及南方分離運動（Hill, 2017）。其中，Hadi 政府與南方分離勢力結合，並與 Houthis 產生衝突（Lynch, 2016）（南方分離運動與 Hadi 政府也曾在 2018 年後發生過數次決裂，但本文主要探討的仍

是 2018 年前的情形，當時南方分離運動仍是與 Hadi 政府結盟)。Houthis 運動的源起可追溯至 1990 年代，其本身為 Zaydis 什葉派的運動，其訴求在於反抗葉門政府將 Zaydi 什葉派邊緣化，同時也反對沙烏地在葉門內部宗教勢力的影響 (Albloshi, 2016)。Zaydis 在葉門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就如同前述有提到的，1962 年被推翻的什葉王國就是以 Zaydis 為主要信仰，該王國對葉門的統治具有久遠的歷史 (2008، الأنسانية)。這一直延續到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葉門面臨新的政治秩序的安排過程，在這過程中由阿拉伯之春前的副總統 Hadi 受到支持，領導其餘舊政治菁英組成政府，Houthis 仍舊不滿被排除於政治安排之外，衝突繼續延燒，也形成後續內戰爆發的動力 (Hill, 2017)。此外，儘管在阿拉伯之春爆發時，葉門出現過跨越教派的單一認同，葉門內部政治環境大抵如同 1962 年，仍舊是缺乏中央權威，並形成地方勢力各據一方的局勢，其中部族仍是重要的社會結構，扮演認同與政治動員的主要動力。

另一方面，在外部層次上中東地區存在著沙烏地與伊朗之間基於地緣戰略與政經因素的角力，同時這樣的角力又常常以所謂教派衝突的角度進行框架與認同建構 (Clausen, 2015)。其背景可以追溯自伊斯蘭認同在區域間的強化，並且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伊斯蘭成為伊朗政體認同的一部份，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也受到相當的矚目。此外，受到石油經濟的影響，沙烏地也有餘力在區域間提升了宗教的影響，並透過向海灣地區移動的阿拉伯移工，向區域間輸出其宗教影響力，使得宗教認同也在阿拉伯社會間提升 (Abdo, 2017)。

因此，由於伊斯蘭認同在中東社會的重要性，再加上上述的影響，這提供了政治菁英進行教派認同操作的基礎。而後，隨著伊朗在 2003 年後的擴張行為，使沙烏地等遜尼國家對伊朗的猜忌加深，這進一步使得教派衝突的框架也在有意無意間加強 (Albloshi, 2016)，例如遜尼國家對所謂「什葉月彎」的恐懼。而在

阿拉伯之春後，更是有許多區域內國家，透過教派認同的操作來分化反對勢力，這也進一步促進了教派認同的強化與競爭（Stacey, 2017）。至此，這也更加的深化沙烏地與伊朗的遜尼和什葉認同，建立了以教派認同為依歸的認同安全困境基礎。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伊斯蘭認同在沙烏地與伊朗境內皆有相當的重要性，因此無論是以遜尼或什葉的認同進行競爭，皆會影響這兩個國家的內部穩定或政權正當性，這也進一步的奠定了內外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基礎。

三、 第一階段的比較分析：認同的背景與來源

而當我們進一步比較兩次葉門內戰中認同的形成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皆呈現了一種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的競爭的分裂，而中央政府則缺乏足夠的正當性與權威進行統治並收編地方。同時也可以看到部族在葉門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其扮演了政治動員的重要角色，使各方政治行為者皆須爭取部族的支持。而這種缺乏單一中央權威的環境，提供了不同認同發展的空間，最終出現了所謂修正主義者以及保持現況者。於是本文所提及的兩場內戰便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中，並在政權轉換之際，由不同勢力進行政治權力的競爭。而在外部層次上，區域間在兩次的葉門內戰期間皆有不同強權在進行競逐，分別為埃及和沙烏地與沙烏地和伊朗，而由於人工疆界等因素，中東地區所呈現的認同分裂情況仍舊延續至今，且可以看到在上述這些國家內部，除了當時所存在的國家主體認同外，仍有其他的認同進行競爭，這也進一步奠定內外部認同的安全困境，並且形成區域國家間的認同競逐。

而當我們進一步討論兩次葉門內戰的變化時，透過對第一階段認同內外安全困境的探討，可看到其主要的差異在於在兩次的時空背景下，中東地區與葉門內部有著不一樣的認同發展與建構。在 1960 年代，中東地區主要的認同主軸在於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認同的競爭，而 2014 年後則在區域間看到所謂教派競爭

的激化，其與沙烏地和伊朗之角力相關。而在葉門內部來說，這兩次的內戰爆發皆與政治權力衝突與角力相關，並且為衝突的主要傳統主軸。而從其內部形成的認同來說，第一次的內戰中，有泛阿拉伯社會主義和共和政體認同，另一方面則有伊斯蘭與王權政體的認同。而在 2014 年的內戰中，則主要是 Houthis 與 Hadi 政府的衝突，除了過去傳統的衝突主軸外，在精英階層的操作下則有教派化認同強化的趨勢，雖然教派並非衝突的核心，但 Houthis 運動的背景卻與 Zaydis 什葉派有關。

而在上述這樣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到，在 1962 年的內戰中，葉門內部行為者與中東地區間競爭的兩個認同陣營，相對來說較為接近，儘管共和政府的認同後來可能受到埃及的主導，但從其革命的起源來看，仍是帶有泛阿拉伯主義的色彩的。而在第二次的葉門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 Houthis 的起源雖帶有宗教色彩，而政治菁英也以教派衝突的角度來定義衝突與戰爭，但 Houthis 所奉行的什葉派與伊朗的什葉派相距甚遠 (Clausen, 2015)，其運動初始來說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可能更單純的像只是修正主義者與維持現狀者的關係，而教派的認同則比較像是政治菁英的操作結果，地方依歸教派認同的動力並不強。簡而言之，相對第一次內戰時沙烏地與埃及關於泛阿拉伯與伊斯蘭路線之爭，2014 年內戰時沙烏地和伊朗所建構的遜尼與什葉衝突，則與葉門內部團體的認同更加遙遠，並非在地政治勢力認同的主軸，是一種來自菁英階層由上而下的建構。因此進一步來說，在 2014 年的內戰中，沙烏地和伊朗兩國在區域間所建構出來這種遜尼與什葉的衝突，對葉門來說是相當外來的，因此可能會更難在葉門內部進行內化(但未否認具有內化的可能，其在衝突的教派化上可以看出跡象)。而這所造成的影響，將會在接續的二三階段中顯現出來。

第三節：第二階段——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在第二階段中，將探討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透過對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探討，我們可以理解在葉門內部形成的認同競爭，同時也能進而理解沙烏地、埃及與伊朗在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行為動機與自我認知，以便後續地階段時與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結合形成相互回應的結構。

一、1962 年葉門內戰

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 1950 年代長期內政上的問題與壓力下，使得北葉門王國的王室遭遇了內部改革壓力的挑戰，而這股改革勢力也受到當時傳入的泛阿拉伯主義的啟發，要求王室進行改革，隨後更是要求建立共和政府來應對葉門的問題，並進行國家的現代化 (Orkaby, 2017)。而在面對泛阿拉伯勢力的挑戰下，葉門王室曾經試圖涵納這股泛阿拉伯主義勢力，並且也進行過數次由王室自身推動的改革，卻也宣告失敗。最終在反王室的改革運動逐漸升溫的情況下，挑戰了葉門王室的統治正當性，王室也因此回歸傳統保守路線 (Orkaby, 2017)，並以伊斯蘭做為號召，試圖對抗泛阿拉伯主義思潮，指稱其為反伊斯蘭的 (Hourani, 2010)。而後，革命發生，王室遭到推翻，並成立共和政府 (YAR 的成立)，但在共和政府未能完全剷除王室勢力的情況下，其在北部高地遭遇支持王室部族的抵抗，雙方對峙僵持不下 (Stookey, 1978)。

我們可以看到共和政府這方的認同與傳統王室間認同在統治正當性上的互斥性，而在共和政府未能完整的收編北葉門各方勢力的情況下，也可以看到葉門內部安全困境逐漸形成。一方面是傳統的王室以及支持他們的部族，他們反對共和政府的建立，原因在於共和政府的路線將對其傳統利益產生影響。其中對王室而言，是統治權力和正當性的競爭，而對這些傳統部族而言，共和政府對於中央

集權的提倡，也將影響其長期以來的自主性 (Stookey, 1978)。另一方面，共和政府面臨了一個政府初建的不穩定狀態，並且欲建立新的國家認同來取代過去 Zaydism 的認同，然而其所秉持的路線卻遭遇了北方高地部族的挑戰，並且在未能剷除這些勢力的情況下，這兩方的認同得以繼續競爭並排擠，形成了葉門內部認同的安全困境——一方面是國家/中央對抗地方，另一方面是泛阿拉伯主義共和對抗伊斯蘭王權，在認同上形成這兩個層次的內部安全困境。

二、 2014 年葉門內戰

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教派在後來成為了主要的認同框架，然而仔細進一步探討的話，這樣的認同建構其實是相當工具性的 (Clausen, 2015)，並服務於政治菁英的操作。在葉門的歷史上，教派認同的差異並非政治衝突的傳統主軸，其主要仍是環繞於地方勢力的競爭為主要的核心政治衝突 (Day, 2012)。Houthis 的成立主要是追求加入政治的安排，並反對中央政府將其邊緣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Houthis 運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其為 Zaydism 什葉派的運動，並反對沙烏地宗教勢力在葉門的介入，但更大的主軸是來自其政治與文化權利的邊緣化，而非教派本身的差異 (Clausen, 2015)。但隨著中東地區出現的教派化現象，政治菁英以教派認同做為操作的工具角逐對內與對外的影響力，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葉門政府指稱 Houthis 為伊朗什葉代理人，並使得衝突朝向教派化發展，而在阿拉伯之春後，這樣教派的趨勢也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成形 (Stacey, 2017)。

因此我們如果進一步探究其認同的話，我們可以發現 Houthis 本身帶有 Zaydism 的什葉伊斯蘭運動色彩，同時也具有地方勢力向中央挑戰的修正主義傾向 (Juneau, 2016)，而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中央政府不斷將其打為什葉派代理人，試圖將雙方衝突導向教派衝突的角度 (Stacey, 2017)。對葉門政府而言，Houthis 在認同層面上的威脅主要應仍是來自於其修正主義的傾向，而非 Zaydism

什葉派本身的這符號。而對 Houthis 而言，其要反抗的是既有政治菁英對維持現狀的堅持。因此在本質上，原本 Houthis 和政府的安全困境是來自修正主義和維持現狀者的衝突，但進一步來說，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什葉派和遜尼派已經成為這兩方的符號來源，也可以說 2014 年的葉門內戰，其認同的安全困境發生過一次轉變，即是從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間的競逐和不互信，漸漸轉移成教派認同的競爭，而在這兩階段的轉移過程中，第一階段的認同競逐其實是相當源自於葉門政治傳統的，然而在第二階段這種教派競逐的框架，卻是相當陌生的，因為傳統上來說，教派認同在葉門並非是相互排斥的（Day, 2012），因此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建構。

三、 第二階段的比較分析：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若是我們進一步比較兩次葉門內戰中，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我們可以發現，這兩次的葉門內戰都出現了如同 Mabon 所提及的內部認同安全困境，出現不同的認同彼此競爭（Mabon, 2018）。在第一次的葉門內戰中，出現了泛阿拉伯主義以及共和政體與伊斯蘭和王權政體這兩個相互排擠的認同。其中，泛阿拉伯主義主張社會主義共和的政府，並強調阿拉伯民族團結，反對反動保守勢力，並且在阿拉伯的團結下反抗殖民勢力（Hourani, 2010）。而王室則主張伊斯蘭作為傳統價值，並謹守跟過去傳統部族的連結（Orkaby, 2017）。透過上述可以看到這兩組認同相互排擠，特別是在正當性上，彼此互相否認具有統治的正當性。於是在這樣的基礎下，任何一方的認同強化，將會是對另一方認同的威脅，並帶來統治或政治權力的不穩定，因此形成了認同上的安全困境。

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Houthis 和中央政府這兩方所具有的認同發生了一些轉變。在起初 Houthis 與中央政府的衝突中，Houthis 的運動雖帶有 Zaydism 的什葉教派色彩，但彼此間的衝突多是對於政治權力邊緣化不

滿的結果，這時期的認同與教派較無關聯，只有政府方試圖將 Houthis 指為伊朗的什葉代理人，但在認同層次上，兩者的教派認同並沒有真的發生排擠的作用，只是 Houthis 的 Zaidism 認同被指稱為什葉代理人，但真正產生排擠者，更多是 Houthis 運動所具有的修正主義傾向，與政府的保持現狀傾向。然而在阿拉伯之春後，衝突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透過前述教派化的過程，逐漸朝向教派化發展，Houthis 所具有的什葉認同開始發生了排擠作用(特別是對外部行為者而言，這將在下節做討論)，也形成了所謂認同的安全困境，也可以說 2014 年葉門內戰中教派認同的衝突性是在政治菁英互動下由上而下建構出來的，並使得認同安全困境的內涵發生教派化的轉變。

因此當我們在進一步探究，可以發現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認同安全困境存在著些許的變化，特別是在認同相互排擠的程度上。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當然存有所謂修正主義對抗保持現狀者的認同層次存在，但雙方行為者本身所具有的認同其實已是相當互斥的，無論是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或者是共和政體與王權政體的衝突，又或是國家中央集權與地方部族自主性的衝突，皆有其明顯的互斥性。在另一方面，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起初 Houthis 和中央政府的認同衝突多還只是修正主義和保持現狀的衝突，而是在後來的衝突中，在菁英階層的操作下才漸漸朝向教派化的角度發展(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後)，但在過去，教派的衝突在葉門並非傳統的政治主軸，Zaydism 什葉派和遜尼派在宗教關係上相比其他什葉派也較為接近，故這樣的衝突是較新的發展，並且相當程度上是外來的。故可以說這樣遜尼與什葉的認同排擠與安全困境，於葉門是在阿拉伯之春後的衝突中才建構出來的。

進一步從內部的角度來看，第一次在 1962 年內戰中的認同排擠性高，泛阿拉伯和伊斯蘭王權的認同在本質衝突的形塑上會比較容易產生對立，不須由上而

下進行建構(甚至這樣的認同也存在由下而上的建構力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內部的改革份子就帶有泛阿拉伯主義色彩)，也較容易促成認同的安全困境，因為認同本身與物質利益和正當性的連結也更為強烈，因此這樣認同所帶來的威脅感會更加嚴重。而在第二次 2014 年的內戰中，則可以看到 Houthis 的什葉認同與遜尼認同的排斥性，反而是在衝突後由上而下透過菁英階層建立出來的，然而這也並非說教派認同毫無結構性影響，其仍舊是可以影響行為者本身的認知，只是這樣的認同建立並沒有如同第一次葉門內戰中有來自地方的形塑力量，故教派認同本身所帶來的威脅度未如 1962 年明顯，只是存在修正主義與維持現狀的衝突。但若是衝突持續延續下去，衝突本身有可能加深教派認同歧異性的建構，這樣的歧異已經可在衝突的教派化中看見，屆時教派認同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就會產生更深的安全威脅意涵。

第四節：第三階段——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三階段將檢視的是葉門內部的認同安全困境是如何進一步影響了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以及外部行為者間的認同安全困境如何的影響他們介入葉門的動機，最後這樣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如何相互回應，形塑了內戰中認同衝突的發展。

一、 1962 年葉門內戰

而在外部的層次上，1962 年葉門內戰時中東地區間主要有埃及與沙烏地這兩國的介入 (Hill, 2017)。而在認同層次上這兩國剛好代表了當時中東地區主要的兩方認同陣營。首先是埃及，其具有強烈的泛阿拉伯社會主義的色彩，強調阿拉伯民族團結與社會主義的路線，並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動勢力。另一方面，沙烏地則代表了伊斯蘭傳統王權的路線，以伊斯蘭價值為依歸，反制埃及的泛阿拉伯主義勢力 (Macqueen, 2013)。而這樣的認同分歧與陣營，也受到了當時美蘇全球

冷戰的影響(美蘇在全球的冷戰對峙也使中東地區劃分成兩個陣營) (Macqueen, 2013)。同時，在埃及與沙烏地內部，剛好也有彼此認同團體的競爭，故埃沙兩國便在當時形成了區域間的認同安全困境，這也使得葉門內戰的發生對這兩個國家產生意義。

對埃及而言，當時中東地區其他泛阿拉伯主義國家的出現也在競爭對泛阿拉伯主義認同的主導權，此時葉門便成為其再次重回泛阿拉伯主義的契機(Stookey, 1978)。另一方面對沙烏地而言，葉門出現一個泛阿拉伯共和政府對於其王權本身已是一個潛在的隱憂，加上埃及的大動作介入和邊境安全的考量下，也支持了葉門的王室陣營進行反制(Wenner, 1967)。在雙方的介入程度上，埃及相對於沙烏地的大動作介入(埃及派駐了大量軍隊，沙烏地相對地只是提供王室金援)，似乎對葉門內部的認同上產生影響。埃及主要支持的共和政府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的控制，這也連帶地影響了 YAR 的認同建構，使其變成埃及的傳聲筒，和葉門的當地認同產生離異，使其變成相當外來的(Wenner, 1967)。其必需得在埃及於 1967 年退出後，才再次與王室陣營進行協商，整體認同也向右靠攏，非過去有強烈埃及色彩的泛阿拉伯社會主義(Wenner, 1967)。

二、 2014 年葉門內戰

而在 2014 年後的葉門內戰中，則可以看到沙烏地和伊朗牽扯於其中。在認同層次上，沙烏地與伊朗在長期於區域間的角力下，形成了所謂遜尼與什葉的認同安全困境。沙烏地方面代表所謂遜尼派的國家陣營，指稱伊朗藉由支持什葉團體的手段，在區域內進行擴張(Clausen, 2012)。另一方面，伊朗本身自 1978 年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斯蘭成為其政體認同的重要部分，而其在區域間進行權力平衡時也常常透過支持特定修正主義傾向的團體來進行不對稱的平衡策略(Juneau, 2016)，同時也在革命後不斷挑戰沙烏地的宗教地位(Abdo, 2017)。

這樣教派的認同衝突也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因為區域內的國家以教派認同的操作分化反對勢力，並使得區域內的衝突教派化（Stacey, 2017）。在葉門，Houthis 的出現對沙烏地而言是伊朗可能的什葉代理人於其邊境上的擴張，然而伊朗實際上對 Houthis 的支持卻是相當間接的，Houthis 是否是伊朗的代理人因此則有待討論（Pradhan, 2017）。儘管如此，在受到與伊朗競逐的影響下沙烏地還是決定出兵介入。而在外部行為者的大力介入下，葉門內部的認同安全競逐也進一步地朝向教派化發展，可看出外部行為者的力量在認同競逐的建構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教派的認同的衝突卻非當地傳統的認同主軸（Day, 2012），因此可說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使得葉門內部認同安全困境加速了轉移的效果，並加深教派化的發展。

三、 第三階段的比較分析：外部認同安全困境

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外部行為者對葉門內部認同衝突的形塑上有很大的影響力。特別是介入程度越高的國家，對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形塑就越有影響力。這或許是因為認同的形塑也和物質上的軍事與經濟影響力有所關係，於是當內部的行為者越是仰賴外部行為者的物質上的支持，其在認同建構的自主性上也相對降低。例如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埃及介入支持 YAR (Yemen Arab Republic, 1962 年的共和政府) 就使得 YAR 本身認同轉向埃及版本的泛阿拉伯主義，反而跟地方發生離異（Dresch, 2005）。

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外部行為者的介入，特別是沙烏地，也將內戰推向教派化發展，而教派衝突的認同是沙烏地和伊朗的建構，而非葉門內部傳統（Clausen, 2015）。此外我們可以看到，由於葉門所具有的分裂性，提供了外部行為者進行認同競逐的場域，區域認同會因為葉門內部的分歧觸發區域間國家的介入，而區域間國家的介入卻也進一步的將外部國家間的認同競爭帶入了葉門內部

的衝突，外部力量的影響力常常主宰了內部認同競爭的話語權，有時會將內部認同的競逐帶離當地的色彩，反而異化了本來地方的認同，例如 1962 年埃及對 YAR 的影響，以及 2014 年外部行為者對葉門衝突的教派化。

另一方面，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上也有些差異。在第一次的葉門內戰中，區域間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與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相比之下在認同上更具有連結性，進一步來說，1962 年葉門內部所發展出來的認同安全困境，與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更加契合，因為內部行為者與外部行為者的認同更為契合，只有後來埃及大力介入後明顯改變了 YAR 的認同，但仍舊是屬於泛阿拉伯主義的範疇。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則可以看到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與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差異更為明顯，外部是關於教派的衝突，內部則是地方勢力和舊有政治菁英的衝突，沙烏地的介入是基於它在外部認同安全困境下的認知，定義了 Houthis 本身認同所帶有的威脅意涵才介入的。

這也影響了後來葉門內戰的形塑，前述有提到外部行為者在介入後，具有異化當地行為者認同的作用，因此當今日外部行為者與內部行為者間的認同分歧程度越高，也代表了這樣的異化程度會越高，進一步來說外部行為者對葉門內部認同的影響互動就越會是由上而下的認同建構，因此我們可以說，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YAR 的泛阿拉伯主義認同與地方部族和伊斯蘭認同的競爭，相較之下更帶有地方色彩，儘管 YAR 後來因埃及而與地方發生離異，但也是這樣的離異造成了後來地方有動力去進行認同的整合調整，並在外部力量退出後得以整合建立向右傾的 YAR 政府，而埃及版的泛阿拉伯主義 YAR 認同則在埃及退出葉門後消退。

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教派的認同是由上而下建構出來，除了葉門內

部本身政治菁英的運作外，也受到外部行為者的影響，因此未來若是外部行為者退出後，葉門在建立新的統一認同時，所帶有的教派色彩會有多濃厚，端看在這段期間內這些外部行為者是否能真的將這樣的教派認同內化。然而，若埃及於1962 到 1967 年間未能在與葉門內部認同更靠近的情況下，將其版本的泛阿拉伯主義認同內化至葉門內部，那沙烏地是否能在未來於葉門完全內化教派衝突的認同，將會是更有挑戰性的。但是，本文最後也能完全否定教派認同衝突深化的情況發生，因若是葉門內部行為者屆時發生本身認同的改變，或是沙烏地能在未來發展出更強的政治經濟力量來提供其認同的輸出，也不能排除當今葉門衝突教派化的發展，會進一步的內化至葉門內部行為者中。

第五節：兩次葉門內戰的延續與差異

最後，可將以上比較分析的討論整理如下表：表中將兩次葉門內戰的發展延續與變化依三階段的過程整理如下頁。

		1962 年內戰	2014 年內戰
第一階段	同	內部缺乏中央權威，提供認同競逐場域。外部皆有強權進行角逐，並透過認同進行競爭	
	異	以泛阿拉伯與伊斯蘭王權的競逐為主，內外認同相較一致	外部為遜尼什葉的競逐，內部為傳統政治權力中央與地方勢力的角逐。
第二階段	同	內部皆呈現中央權力的缺乏，地方勢力的競爭	
	異	內部認同的建立較具當地特質，為由下而上的建構	內部認同的建構出現教派化的跡象，且教派認同為由上而下的建構
第三階段	同	殖民影響下形成人工疆界，外部行為者也以認同做角逐權力之工具，也對內部行為者造成衝擊	
	異	內外部行為者認同的契合度相對較高	內外部行為者的契合度較低，但從教派化的跡象來看有內化的作用

表 4-1 比較分析

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可以看到，由於葉門內部缺乏完整的中央權威，呈現了相當的分裂，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競爭，部族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這樣的情形下也提供了不同認同的發展和競爭空間，也進一步產生了修正主義者和維持現狀者的競爭。同時在外部層次上，由於人工疆界等因素，可以看到不同強權以不同的認同進行角逐，並奠定了認同安全困境的基礎。另一方面，這兩次的葉門內戰的時空背景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外部的認同層次上，區域間存在從過去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王權的競爭，發展至今則有遜尼與什葉的衝突。在內部的方面，則可以看到從過去泛阿拉伯共和與伊斯蘭王權的爭執，到今日 Houthi 與 Hadi 政府的競爭，而後者也在菁英階層的操作加上區域間宗教認同的提升下，從過去政治文化權的衝突，朝向教派化的發展。最後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1962 年外部行為者的認同——泛阿拉伯與伊斯蘭王權與葉門內部行為者的認同較為契合，而在 2014 年的內戰中，什葉與遜尼的衝突認同則是由上而下的建構出來，因其並非葉門傳統政治主軸(過去多是以地方勢力競逐有關)，而這樣外部與內部認同的差異會在後續認同安全困境的建構上顯現出來。

而當我們進一步檢視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時，我們可以看到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時，出現了相互排擠的認同。泛阿拉伯共和政府與泛伊斯蘭王權相互競爭彼此的正當性，且本質上具有互斥的性質，因此任何一方的認同強化，都將會是對另一認同的威脅。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雖然 Houthi 本身的運動在地方層次上帶有教派色彩，但其和中央政府間的衝突若以認同層面來說，在起初是單純修正主義與維持現狀者間的競爭。只是在後續政治菁英的操作下，衝突朝向教派化發展。Houthi 和中央政府間這種什葉對抗遜尼的認同衝突框架，是由上而下的建構。而相較之下，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泛阿拉伯共和與伊斯蘭王權兩種認同的衝突則是含有較多來自地方的建構力量，因此其認同在本質上，無論泛阿拉伯與伊斯蘭或是共和與王權，在正當性的競爭上是較具有排斥性的。但

若是衝突持續延續下去，衝突本身有可能加深教派認同歧異性的建構，這樣的歧異已經可在衝突的教派化中看見，屆時教派認同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就會產生更深的安全威脅意涵。

若我們從外部的層次上來檢視時，可以看到外部行為者對認同形塑的影響力。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埃及的介入使得葉門 YAR 政府認同轉向埃及版本的泛阿拉伯主義，與當地的認同脫節。而在 2014 年，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也使得教派化的發展加速。我們可以看到，當外部行為者具有相當強的物質力量時，在認同的形塑上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當內部行為者仰賴這些外部行為者的支持時，其也失去部分的話語權。因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葉門內部的分裂競爭，也會驅使區域間的國家因自身與他者的認同安全困境的競爭而進行介入，然在介入後其在認同的形塑能力上也較具優勢地位，異化了內部行為者的認同。

最後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外部行為者與內部行為者認同的契合度上，1962 年的葉門內戰相較 2014 年更具契合性。儘管在 1962 年埃及對 YAR 的影響甚鉅，但 YAR 的起源終究還是泛阿拉伯主義的。而在 2014 年，沙烏地的大力介入是源自他與伊朗的競逐，而介入後對葉門內部衝突教派化有很大的影響。而教派衝突卻非葉門傳統政治主軸，因此可以看到葉門內部認同安全困境與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具有差異。進一步來說這樣由上而下的認同形塑，在外部勢力退出後是否能維持教派認同的存續，將端視這段期間內這樣教派衝突的認同建構是否能成功內化進當地認同中，若是沒有，那它勢必會像在 1960 年代時那樣，在外部勢力退出後，葉門內部的行為者將會自行調整定建構自身的新認同，回歸當地的特質。

第五章 結論

在 1962 年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都可以看到內外行為者沿著某種認同的分歧線，形成一種內外回應的作用關係。而為了進一步探討這樣的相互回應的關係，以內外的認同安全困境去梳理並提出了三個研究問題：在這兩場葉門內戰中有存在何種的認同分歧？認同的內外安全困境如何的型塑了兩次的葉門內戰？同時在兩場葉門內戰中，這樣的內外認同安全困境有怎樣發展延續和歧異？

首先在存有的認同分歧部分，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主要有四方行為者。首先在內部的層次上，有共和政府和保皇派兩方。其中，共和政府的認同屬泛阿拉伯社會主義，為改革勢力的集合，屬修正主義者。而保皇派方面則強調伊斯蘭的認同，並以王權為依歸，屬於保持現狀者。在外部層次上，則可以看區域間主要有沙烏地與埃及兩國的介入。埃及此時為世俗的共和政體，代表了當時中東地區間的泛阿拉伯主義陣營，而沙烏地則是會強調以伊斯蘭做為區域團結的論述，同時為王權的政體。而在 2014 年所爆發的葉門內戰中，本文則檢視了以下四方行為者。首先在內部層次上，有政府方及 Houthis。此時葉門政府為受轉型計畫支持的舊政治菁英，同時以教派化的框架論述此次葉門內戰。另一方面，Houthis 則在地方層次的運動上帶有什葉派色彩，但進一步來說他在衝突發生時也是挾帶了阿拉伯之春以後的改革聲勢，是為對現有建制提出挑戰的修正主義者，同時在教派化的框架下，被視為是伊朗的什葉代理人。在外部層次上，本文檢視了沙烏地與伊朗兩國，沙烏地與伊朗在區域間的權力競逐下，有意或無意的強化自身的宗教認同，分別以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認同自居或檢視對方。

而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也都可以看到，內外部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回應關係。在內部層次上，兩次的葉門內戰中皆形成了不同的認同安全困境(泛阿拉伯

主義與伊斯蘭(遜尼與什葉)，同時也進而驅使了外部國家基於他們的自身認同安全困境(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進行介入。而在介入之後，由於內部行為者仰賴外部行為者的支持，外部行為者也將其認同角力帶進內部的層次上，進一步限縮了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的力量，或是像 2014 年的內戰中，強化了由上而下的教派認同衝突的建構。至於葉門自身統一認同的建構可能必須得待外部行為者退去後，才有自行建構的可能。例如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一直要到 1967 年埃及與沙烏地退出後，內戰雙方才重新建構了自身認同，轉變為右派的保守共和政府。

而在比較兩次的葉門內戰後可以看到，葉門內部缺乏中央權威的特性，使得葉門易陷入分裂，形成不同認同競爭的場域。同時在外部層次上，由於中東地區人工疆界等因素，不同強權以不同的認同進行角逐，奠定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相較於 2014 年，內部的認同更具互斥性。泛阿拉伯共和政府與泛伊斯蘭王全相互競爭彼此的正當性，且本質上具有互斥的性質。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雖然 Houthis 本身的運動在地方層次上帶有教派色彩，但其和中央政府間的衝突若以認同層面來說，是在後續政治菁英的操作下朝向教派化的脈絡發展，因此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建構。相較之下，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的認同有較多來自地方的建構力量，因此其認同在本質上，與地方的離異較少。但若是衝突持續延下去，衝突本身有可能加深教派認同歧異性的建構，這樣的歧異已經可在 2014 年後的衝突教派化中看見，屆時教派認同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就會產生更深的安全威脅意義。

另一方面，在外部行為者與內部行為者認同的契合度上，1962 年外部行為者的認同——泛阿拉伯與伊斯蘭王權與葉門內部行為者的認同較為契合，反觀 2014 年的內戰中，什葉與遜尼的衝突認同則是由上而下的建構出來，因其並非葉門傳統政治主軸。1962 年埃及與葉門的共和政府雖在泛阿拉伯主義的不同面

相上有所歧異，但在本質上還較為接近的。相較之下在 2014 年，沙烏地的大力介入是源自其與伊朗的競逐，而介入後對葉門內部衝突教派化又有很大的影響。然而教派衝突卻非葉門傳統政治主軸，因此在外部勢力退出後是否能維持教派認同的存續，將端視這段期間內這樣教派衝突的認同建構是否能成功內化進當地認同中。若是沒有，那它勢必會像在 1960 年代時那樣，在外部勢力退出後，葉門內部的行為者將會自行調整建構自身的新認同，回歸當地的本質。

綜上所述，本文可以做出以下結論。首先，可以看到葉門如同其他中東地區國家受到人工疆界與跨國界認同的衝擊，加上內部中央權力的缺乏，使得葉門內部呈現相當的分裂，統治者必須小心經營各方勢力的平衡才得以進行統治。也因此，葉門所具有的分裂狀態容易提供不同認同的競爭環境，也容易成為區域行為者競爭認同的場域。如在 1962 年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葉門在內戰中陷入新舊政治權力轉移的階段，使原本的就虛弱的中央權力直接再被削弱，葉門內部不同勢力的競爭白熱化。與此同時，葉門內部也出現不同的認同相互競爭統治正當性，而這也因前述中東地區跨國界認同的因素，吸引了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並在葉門進行這些區域外部行為者的競逐。

第二，在一個強力的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下，內部的行為者很容易就會被限縮其認同的建構能力。以文中兩次葉門內戰為例，皆可以看到在外部行為者具有較大的權力之下，外部行為者對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能力就有所限縮。以文中兩次的內戰為例，在 1962 年的內戰中可以看到，在埃及大力支持 YAR 的情況下，埃及派軍介入葉門內戰，同時也輸出其自身版本的泛阿拉伯社會主義至葉門。而這也造成了 YAR 與葉門自身行為者的疏離。而在 2014 年的內戰中則可以看到，外部行為者如沙烏地，更是以自身在外部的認同競爭來看待葉門，將其所謂教派認同競爭的論述框架套入葉門，並加速葉門自身衝突的教派化進程，儘管在過去，

教派認同並非傳統的葉門政治主軸。

最後，本文也看到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認同本身具有的意涵是隨著時空變化而有所差異。以本文所檢視的這兩場葉門內戰為例，剛好可以探討葉門在現代化國家進程上的源頭與現今兩端，認同所扮演的意涵變化。在 1962 年終的葉門內戰，其競爭主軸為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同時也是共和與王權的競爭。而在 2014 年時則是從中央與地方勢力的競爭，透過教派化的過程形成遜尼與什葉的對抗。其中有趣的是，在 2014 年時，沙烏地以遜尼支持者自居，然而在 1962 年時，沙烏地卻支持身為什葉派的王室。因此可以看到，或許認同的本身會具有相互排擠的特質，但更多時候認同所具有的排擠性或許是來自行為者如何進行建構。透過文中的例子可以看到，在 1962 年時，什葉派的認同對沙烏地而言並不具威脅感，反而是共和政體認同所帶來的威脅感更加劇烈。這或許顯示了當今中東地區所謂教派認同的衝突，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行為者在互動之間有意無意建立起來的。

而上述的情況也進一步的顯示了認同在中東地區的特殊情況。可以看到中東地區許多行為者藉由認同做為區域競逐的工具，而在這樣競爭的過程中，因為以認同作為政策工具的緣故，很容易將本來在區域間和諧共存的不同認同異質化，甚至形成排斥的狀態。以本文所提到兩次葉門內戰為例，在 1962 年時，什葉與遜尼的分歧未對區域國家帶來任何安全威脅的意涵，反而是泛阿拉伯主義與共和政體等認同對沙烏地而言具有威脅感。而什葉的認同要具有威脅的意涵必須至伊朗伊斯蘭革命後，才開始進展。在伊朗與沙烏地競爭宗教影響力下，各自以支持不同的教派團體作為權力競逐的工具，另一方面卻也漸漸地塑造了當今中東地區這種遜尼與什葉互相對抗的論述框架。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今教派認同的衝突是種建構出來的結果，而非源自於教派本質上所具有的歧異。至於是否所有認同的

衝突皆是建構出來的，又或是有些認同本質上具有相當的歧異？或者認同的衝突有那些部分是來自社會建構，那些來自其本質的差異？這些問題或許是本文未能探討完全的，未來或許能往這些方向進一步研究。

而對於未來葉門內戰的發展，本文認為在外部行為者沙烏地與伊朗仍持續介入的情況下，葉門內戰的雙方將會持續的僵持下去，因為他們都有足夠的勢力去維持僵局，卻沒有一方有決定性的力量能改變現況。而在外部行為者的影響下，葉門內戰的各方也無法建立一個和解的框架。此外，若是現行的對話框架中無法建立內戰各方的互信，那也將難以成立一個統一的葉門政府。就算到時能夠真的成立一個政府治理葉門，若是各方派系還是保持這種分裂的環境，無法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那葉門再次陷入內戰的可能仍是相當高的。因此，對於未來調停葉門內戰上，本文有以下淺見：首先是要提供外部行為者退場的誘因，讓葉門自身得以建立和解的框架，消除在衝突中建立的分歧。其次，葉門自身須建立一個穩固的中央權威去調和各方勢力，整合已經分裂的葉門政治環境。然而以上的建議並非一蹴可幾，甚至在實行上也未必能如此理想達成，而這是本文為能解決之問題，因此葉門內戰的和解之道還有待未來研究者的投入才能釐清。

參考文獻

書籍

- Abir, M. (1994). *Sua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i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Akçalı, E. (2016).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aker, R. W. (1978). *Egypt's uncertain revolution under Nasser und Sadat*.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 Blumi, I. (2012). *Chaos in Yemen societal collapse an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London: Routledge.
- Cleveland, W., & Bunton, M. (2012).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5th e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Clark, V. (2010). *Yemen: Dancing on the heads of snak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resch, P. (2005). *A history of modern Ye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esch, P. (2001). *Tribes, government, and history in Yem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ay, S. (2012). *Regionalism and rebellion in Yeme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ll, G. (2017). *Yemen endures*.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nnebusch, R. (2009).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awcett, L. L.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nnebusch, R. A., & Ehteshami, A. (2014).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Hopwood, D. (1983).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1981*. London: G. Allen & Unwin.
- Hourani, A. (2010).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rieg, A. (2017). *Socio-Political Order and Security in the Arab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 Lynch, M. (2016). *The new Arab wars*. NY: PublicAffairs.
- Mabon, S. (2018). *Saudi Arabia and Iran: Power and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 Co.
- MacQueen, B.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Middle East Politics*. London: Sage.
- Masad, M. & Christie, K. (2013). State Formati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Christie, K., & Masad, M. (Eds).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p. 15-3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enoret, P. (2017). Saudi Arabia. In Lust, E. (Ed.). *The Middle East* (pp. 737-754) Thousand Oaks, CA: Sage/CQ Press.
- Morgenthau, H. J., Thompson, K. W., & Clinton, W. D. (2006).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Orkaby, A. (2017). *Beyond the Arab Cold War*.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adhan, P. (2017). *Arab spring and sectarian faultlines in west asia*. Virginia: Pentagon Press.
- Al-Rasheed, M. (2002).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Rasheed, M., & Vitalis, R. (2004). *Counter-narra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ogan, E. (2011). *The Arab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almoni, B. A. (2010).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 Santa Monica, CA: RAND.
- Stacey, P. Y. (2017). Sectarianization, Islamist Republicanism, and International Misrecognition in Yemen. In Hashemi, N., & Postel, D. (Eds.)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pp. 185-198). London: Hurst & Company.
- Stookey, R. W. (1978). *Yemen: the politics of the Yemen Arabic Republic*. Boulder, CO: Westview.
- Szekely, O. *The Politics of Militant Group Survival in the Middle East*. Stuttgart: Springer Nature.
- Telhami, S., & Barnett, M. N. Introduction: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n Telhami, S., & Barnett, M. N. (Eds.).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pp. 1-2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 (201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Ill: Waveland.
-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ner, M. W. (1967). *Modern Yemen 1918-1966*.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Wenner, M. W. (1991). *The Yemen Arab Republ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an ancient land*. Boulder: Westview.

期刊文章

Abdi, R., & Basarati, A. (2016).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Yemen Crisis in Ideologically-Loaded Newspaper Headlines. *GEMA Online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16(3), 37–52. <https://doi.org/10.17576/gema-2016-1603-03>

Adra, N. (1998). Dance and glance: Visualizing tribal identity in Highland Yemen. *Visual Anthropology*, 11(1-2), 55-102. doi: 10.1080/08949468.1998.9966746

Akbarzadeh, S., & Barry, J. (2016). State Identity in Iranian Foreign Polic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3(4), 613-629. doi: 10.1080/13530194.2016.1159541

Barnett, M. (1995). Sovereignty,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Arab States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479-510.

Cui, C. C., & Adams, E. I. (2002).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D: An assessment in yeme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6), 637-662. doi:http://dx.doi.org/10.1108/02651330210451953

- Juneau, T. (2016). Iran's policy towards the Houthis in Yemen: A limited return on a modes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3), 647-663. doi:10.1111/1468-2346.12599
- Malmvig, H. (2014). Power, Identity and Securitization in Middle East: Regional Order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19(1), 145–148. <https://doi.org/10.1080/13629395.2013.856181>
- Mellon, J. (2002). Pan-Arabism, pan-Islamism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e Arab World.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8(4), 1-15. doi: 10.1080/13537110208428675
- Nevo, J. (1998).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4(3), 34-53.
- Niarchos, N. (2018). Making War. *New Yorker*, 93(45), 30.
- Rose, G.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 Rubin, B. (1991). Pan-Arab Nationalism: The Ideological Dream as Compelling For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6(3/4), 535-551.
- Swagman, C. F. (1988). Tribe and Politics: An Example from Highland Yeme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4(3), 251–261.
- Zweiri, M. (2016). Iran and Political Dynamism in the Arab World: The Case of Yemen.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5(1), 4-18. doi:10.1111/dome.12078

Al Jazeera. (2020, February 18). Tribal forces in eastern Yemen clash with Saudis.

Retrieved January 05, 2021,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2/18/tribal-forces-in-eastern-yemen-clash-with-saudis>

Al Jazeera. (2020, March 25). Saudi forces torture, disappear Yemeni civilians: HRW.

Retrieved January 05, 2021,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3/25/hrw-saudi-forces-torture-disappear-yemeni-civilians>

Al Jazeera. (2020, April 11). Yemen's Houthi rebels sentence four journalists to death.

Retrieved January 05, 2021,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4/11/yemens-houthi-rebels-sentence-four-journalists-to-death>

Yemen's tribes face the Houthis all alone. (n.d.). Retrieved January 05, 2021, from

<https://www.mei.edu/blog/yemens-tribes-face-houthis-all-alone>

Younes, A. (2020, April 27). Dividing Yemen a key Saudi-UAE objective, analyst says.

Retrieved January 05, 2021,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4/27/dividing-yemen-a-key-saudi-uae-objective-analyst-says>

أحمد محمود حسن وتاج السرحان. (2008). *السياسة الخارجية في عهد المالك فيصل بن عبد العزيز السعود*. بيروت: الدار العربية للموسوعة.

المركز العربي للدراسات الأنسانية. (2008). *الحوثية في اليمن*. صنعاء: المركز العربي للدراسات الأنسانية.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ؤلفين السوفيت. (1990). *تاريخ اليمن المعاصر 1918-1982*. (مكتبة مدبولة، المحرر، و محمد علي البحر، المترجمون) القاهرة.

